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汪妍

学号：20110004

所别：社会学研究所

专业：社会学

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导师姓名及职称：张雪梅 副研究员

完成时间：二 一四年六月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提交学位论文的纸质版与电子版一致，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 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关于收集、保存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按照学院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院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且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授权给有关单位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摘要

农民工作为中国的特殊群体，其社会流动问题关系重大。学术界关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颇多，但主要是站在宏观或者中观的层面进行研究，微观研究鲜有涉足。由于农民工阶级内部分层日趋明显，处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其经济社会地位差距较大，一部分群体已经实现了经济社会地位向上的社会流动，但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却刚刚满足温饱。处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群体其需求具有差异性，在满足其需求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有较大的不同。

笔者将从微观的层面上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借助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我看·成都生活”与“我看·锦江生活”两个影像志活动选取本论文的研究家庭。对参与影像志活动的 62 个家庭进行初步访谈之后，选定四个举家外出务工达十年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作为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家庭代表，进行深入访谈，搜集资料。并借助口述史研究法分析处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实现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首先，广泛阅读文献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设计本论文所需的关键词字词表以及中文情绪字词表；其次，在完成前期准备后开始本文的正式访谈，分别获取四个家庭赋有年份、分值和事件的大事记，梳理出四个家庭来 S 市务工后的家庭大事脉络，了解四个家庭务工生活的梗概；然后，在获取四个家庭大事记的基础上进行多次深入访谈并录音，大事记中的每一件大事件即为一次访谈的主线，按照此主线设计包括事件、经过、结果三部分的访谈提纲，在访谈提纲的引导下进行访谈，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作为本研究的原始资料，并对关键词字词表和中文情绪字词表进行修改使其更具实用性；再次，借助关键词字词表和中文情绪字词表对原始资料进行大事记和访谈资料分析；最后，通过对出现的情绪进行分析，试图从侧面印证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口述内容对情绪的激活程度。

本研究结论如下：农民工家庭的大事件，主要包括家人朋友（社会）、生意、子女教育与发展、住房、医疗健康、讨薪六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的排斥、传统的户籍制度有关的资源分配制度是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主要限制因素；农民工口述正性事件言辞简略，而口述负性事件较详细；正性事件对情绪激活较弱，负性事件对情绪激活强烈。

本文是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采用口述史方法的尝试，四个家庭所代表的是农民工内部出现分化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本研究中，对口述资料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期在回答本文研究问题的同时还可为农民工研究保留鲜活的一手资料，在回答本研究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还具有鲜活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因素；口述史

## 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in China, peasant-worke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 mobility.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peasant-workers in academia, but mainly on the eyes of macroscopic scale or meso level, few involved in the micro research. Because the internal delamination of migrant worker class has come out obviously, there is a big ga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between peasant-workers in different levels, some elite groups has been completely upward upper-class in academic society, but there is still a part of peasant-workers just can make a living. Thanks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needs of peasant-workers in different level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ffected in the process of satisfying their demand are also different.

The author will do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mobility of peasant-worker from the micro level. This paper chose families from the two activities which are called “we see life in chengdu” and “we see life in jinjiang” hold by Ai Da Xun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fter the preliminary interview on the sixty-two families from the two activities , we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our families who have worked outside over ten year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oral history metho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tool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society mo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s in different levels.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references , we design the two lists Keyword phrase list and Chinese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mentor. Secondly, we began the formal interview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preparation of this paper, get four families which were endowed with the year, scores and important events, Sort out the context of the four families’ important events, understand the gist situation of the four families’ life, then,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m and recorded it, each important event is the main line in a interviews , follow this main line design outline including the three-part: events, processes, results, conducted interviews According outline, Put the tape into written materials after interviews as original data, revise the two lists Keyword phrase list and Chinese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 to make them more practical. Thirdly, we use the two tables to help u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interview materials.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zing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interview materials, we are trying to find out the main factors of affecting the peasant-worker’s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flow upwar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we hop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keep the origin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oral information.

**Keywords:** peasant-worker ; social mobility ; affecting factors ; Oral History

<http://www.ixueshu.com>

#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
一、现实意义.....	2
二、理论意义.....	3
第二章 文献综述.....	4
第一节 口述史.....	4
一、口述史的产生和发展.....	4
二、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运用.....	5
第二节 社会流动.....	6
第三节 农民工.....	10
一、农民工的由来.....	10
二、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12
第三章 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思路.....	1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5
第二节 解决思路.....	15
一、研究目的.....	15
二、研究对象.....	16
三、研究思路.....	17
第三节 论文主要创新点.....	17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介绍.....	18
一、研究方法.....	18
二、研究工具.....	19
第四章 四个家庭的十年：基于大事记的轨迹分析.....	23
第一节 四个家庭的基本情况介绍.....	23
第二节 四个家庭的大事记分析.....	25
一、大事记的内容.....	25
二、大事记分析.....	29
三、四个家庭大事记分析小结.....	34

第五章 四个家庭口述资料分析.....	37
第一节 口述资料的内容分析.....	37
一、口述资料内容简介.....	37
二、单个家庭口述资料的关键词内容分析.....	37
三、关键词综合内容分析.....	47
第二节 口述资料情绪字词分析.....	54
一、单个家庭口述资料中出现的情绪分析.....	54
二、四个家庭口述资料中出现的情绪综合分析.....	56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5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58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58
二、讨论.....	59
第二节 本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61
一、本研究的不足.....	61
二、进一步研究展望.....	62
参考文献.....	63
致谢.....	66
个人简历.....	67

<http://www.ixueshu.com>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称谓是中国所特有的，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这个特殊的群体是在中国大陆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它的产生不仅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关，也与中国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步伐不可分离。

国家统计局 2014 年 5 月 12 日发布的《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 万人，增长 2.4%。其中，16610 万外出农民工，增加 274 万人，增长 1.7%；本地农民工 10284 万人，增加 359 万人，增长 3.6%。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13085 万人，增加 124 万人，增长 1.0%，举家外出农民工 3525 万人，增加 150 万人，增长 4.4%。

目前，制造业工人中大约 60%是农民工，煤炭等真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 80%-90%是农民工，建筑工地上 80%左右的是农民工。显而易见，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正在逐步朝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变化；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都饱含了农民工的辛勤汗水，凝聚着农民工的心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农民工进城务工，对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城乡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如此庞大的农民工数量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群体的现状，虽然学术上对农民工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农民工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在政治方面，农民工干了与城市工人一样甚至更多的活，却连应有的工人身份都没有得到；在经济方面，农民工和城镇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权，同工不能同时，同工不能同酬现象严重；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尽管在一个城市务工多年，因为他们是农村居民的户籍，他们始终是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在文化教育方面，不管是农民工自身还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均受到限制。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小的方面来说直接关系到农民工能否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就大的方面来说，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是否能够得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否继续保持。在每个人都在努力实现自己“中国梦”的时候，是否有人关注

---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陆学艺. 《“三农”绪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013.

农民工如何实现他们的“中国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力图缓解农民工压力，试图解决农民工问题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否真的落到了实处，是否让农民工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或许农民工个体才最有话语权，他们的切身感受才能真实的反映他们的心声与他们的需求。

在学术上，目前为止的大多数与农民工相关的研究是集中在宏观的层面或者是中观层面上，很少有从微观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关注到个体家庭的研究也是比较少的，更少有研究关注到个体农民工的话语权，本论文则是从农民工个体家庭层面着手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现实意义

农民工群体仍然占据比较大的比例，且农民工的总数在逐年上升，研究农民工群体有助于缓解农民工压力，尤其是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更能够抓住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真实材料，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的主要现实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农民工问题，尤其从微观层面上关注个体家庭的研究，有利于关注到个体的心理、行为等的变化，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实现“中国梦”。

2、从微观层面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尤其是从家庭入手可以关注到农民工个体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现状，以及国家的大政方针落实到个体层面上时是怎么样的。

3、口述史研究方法能够更真实更贴切的反映个体的真实想法，更能够在关注个体的话语权的同时为后来者研究农民工群体保留鲜活的一手资料。

4、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口述史的研究，分析在个体家庭层面上向上流动的瓶颈问题，力图为突破向上流动的瓶颈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分析。

5、分析农民工家庭在实现向上流动所遇到的障碍和制约条件。少数农民工虽通过技能、知识、人脉关系和拼搏精神成功实现了职业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人收入，如个体户，但与城市社会精英阶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他们容易遇到发展瓶颈而难以继续向上流动如无法创办私营企业等。本文运用口述史方法，进行提炼总结，力图通过分析得出农民工家庭进一步向上流动的制约因素。

## 二、理论意义

关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有学者们运用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支撑起研究的进行,比如社会流动理论、推拉理论、精英循环理论等。不同研究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理论都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多半研究都是站在宏观或者中观的层面上做的研究设计,得出的研究结论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落脚到以农民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目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实践中都是比较少的,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的更是少见。本论文则是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力图在关注农民工个体家庭的基础上探寻农民工自己认为影响其流动的因素是什么。本论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意义:

1、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都是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本文的口述史研究关注的是微观层面,最终的落脚点是农民工个体家庭,有利于微观层面理论研究实践的充实。

2、有利于从微观层面上运用社会流动理论,并运用其支撑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3、目前,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更主要的是针对某个大人物的传记或是某个地区的要事辑要等,较少有以普通的小人物为研究对象,更少有以普通的单个家庭为研究对象,本论文则是以普通的小人物为口述史研究的对象,基本的研究单位是小人物的家庭,可以扩充口述史的研究范围。

4、研究工具大事记的运用,在方便口述史研究的同时,也可以为类似的研究提供一种比较实用的研究工具。

5、关键词字词表与中文情绪字词表的综合运用是本论文内容分析的主要研究工具,可以作为定性研究中新工具的实践,可以为定性研究方法做出实践性的探索。

6、揭示农民工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差异和分化的事实。农民工的职业分化是农民工职业分布的显著性特征,少数农民工已跨越了初级或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职业向上流动,提高了经济地位,农民工传统形象和特征在这部分人身上表现甚微。农民工中的少部分优秀分子完全可以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制和制度障碍,实现更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若仍运用早期理论和观点来研究预设农民工的社会阶层地位,便会忽视向上流动这一重要现实。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口述史

#### 一、口述史的产生和发展

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口述就是人们记述生产生活经验以及传承历史的最主要的方式，如大禹治水的传说以及《史记》、《荷马史诗》的撰写都是借助口述完成的，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迄今为止，在口述历史的法律与道德、操作方法，甚至概念等方面在学术上都未形成共识。但是口述史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科，口述史是指由访谈者借助一些辅助性的工具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搜集并记录对受访者有特殊意义的口述历史记忆，这种口传历史记忆亦称为“生活史”或“传记性访谈”。口述史作为现代学科，大家公认的是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目前学术上有关口述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1) 针对重要人物的口述史分析。最早来自于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引进，如《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将视角转向了小人物，如《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涛口述回忆录》，该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通过他们的口述给人们展示了这些人物背后的大时代。对著名学者、作家的口述史研究也是国内口述史的重要领域，如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

(2) 针对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例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口述历史，如《口述历史辑要》。

(3) 针对某一社会或文化现象的研究。这一类口述史著作往往从社会学、人类学、或文化学角度出发，围绕研究的主题，运用大量田野调查，将事件和人物的片段串联起来，阐述口述背后的深层内涵。如李小江教授主持的“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出版了《让农村人说话：文化寻踪》，吕国光《农民工口述史》、胡明刚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者口述实录》、《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4) 对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的研究。如《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5) 口述史理论研究的著作：保罗·唐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

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史》、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周新国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李向平的《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陈旭清的《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都是口述史的理论研究著作。

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的研究现状如下：

(1) 进一步深化对口述史的理论研究。

(2) 进一步增强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关联性。

(3) 进一步系统化对口述史研究：首先，对口述史的在学术上的地位有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更明显地区分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对口述史研究中研究方法和程序以及不同类型的资料的处理，有了更统一的思考。

(4)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更加多样化，现在可以借助如录音笔、摄像机等现代设备还原访谈现场，抓住口述人物的一些细微的表情帮助研究者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 二、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运用

口述史最早运用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中，由于口述史获取资料的直接性、生动性等特性使得社会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实，减少研究者的主观性，口述史也成为了社会学研究者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

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的学者按阶段探讨了口述史从引进到自我建构的发展过程；有学者按时间探讨了1950年以来有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与交流平台的固定性与多样化，并总结了各时期的研究的集中点以及研究模式的转换；有的学者从口述的对象、研究者的发展变化、讨论了口述史从大人物到小人物的转变、从史学到其它学科、从学术到媒体、从史学者到其他学者的转变；有的学者讨论了口述史所采用的技术手段。

口述史在社会学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口述史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完善方面的研究，如王铭铭刊登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的《口述史·口述传承·人生史》、王尧刊登于江海学刊的《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等；对农民工的研究，如《农民工口述史》、《中国农民工口述实录》；对女性的研究，如郑丹丹的《痛苦的社会建构——一个女子的口述史分析》、李慧波的《基于口述史资料收集方式下的老年妇女生存模式探究》、德国北威州科学研究中心多萝荪·维尔琳的《口述史与妇女历史研究：来自德国的经验》等、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以及韩宁平的《农民的妻子：20世纪前期徽州妇女的口述史之

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常建阁.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2（11）.

章玉钧.从中国大陆口述史发展态势、动因展望未来之路.[J].中国文化论坛，2011（1）.

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5）.

一》；对老龄化问题、HIV 成阳性者、婚姻家庭等社会学研究领域亦可以使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由于笔者研究的是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现对口述史在农民工研究中运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目前学术界以口述史的方法对农民工进行的分析有一定的倾向性，主要有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切入研究，关注女性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甚至是歧视现象，如韩宁平的《农民的妻子：20世纪前期徽州妇女的口述史之一》；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农民工的口述史研究，关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法律知识的缺乏以及没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多农民工均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雇主很少给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口述史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已经由当初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演变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艺学等学科重要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在社会学中运用范畴较广，运用此方法对农民工群体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把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以家庭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对农民工进行的研究在学术界还少有。

## 第二节 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变或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这种转变或转移根据其方向性主要有两种最基本形式，即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社会流动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riin, A. Sorokin）的《社会流动》一书奠定的。人口的社会变动与社会流动息息相关，人口的社会变动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相应的社会流动一定会导致人口的社会变动。

社会流动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社会流动的模式分为开放性模式和封闭模式，开放模式是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都比较频繁的社会流动模式，比如美国国会便是开放性的社会流动模式；封闭模式是仅有部分水平流动且很少或没有垂直流动的社会流动模式，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便是封闭的社会流动模式。

社会流动受自然因素以及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在内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先赋和自致在内的个人因素的影响。社会流动主要可以通过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的改变、权力的控制、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的改变来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应该是在遵循机会平等原则、普遍性原则、自致性原则来完成社会流动。

---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背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个人先赋因素形成的社会资本由三圈组成：第一圈为父系家族，即以核心家庭自身以及与核心家庭具有血亲关系的父系家族，包括爷爷奶奶的兄弟和父母的兄弟建立的家庭；第二圈为母系家族，即与血亲家庭具有血缘关系的母系家族，包括爷爷奶奶的姊妹建立的家庭和父母的姊妹建立的家庭；第三圈为与核心家庭没有血缘关系的基于地缘、业缘及兴趣爱好而结成的朋友。陆学艺认为，改革开放后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愈来愈小，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制度和政策安排的作用仍然十分明显，一些不利于社会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仍然十分突出，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由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是处于社会底层或者是较低经济社会地位的农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层层阻隔下坚持不懈地向城市流动，是因为城市中有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即通过职业的调整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

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其次，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业等非农业的流动；最后，在阶层上，由低收入农业劳动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

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能够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利于给农民工提供精神支持和经济帮助以及信息的获得，但却难以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地位的“跃进”或者提高，这导致了农民工大多数只能在水平层面进行社会流动。

拉文斯坦运用迁移法则提出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人口自由流动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出地表现出社会流动的推力，流入地表现出社会流动的拉力，推力和拉力共同促进了社会流动的进行。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作为农民工的流出地，农村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批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城市高收入的吸引流入城市。农村的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收入少、缺乏发展前景、低生活水平以及到城市打天下的从众心理，城市的拉力主要表现为较高的经济收入、优越的生活条件、开阔的视野、广阔的发展前景等。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从两个层面来解释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层面的社会流动即精英—精英流动，此流动主要是个体之间的循环；第

---

王文龙.社会资本、发展机会不平等与阶级固化.[J].首都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

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李培林.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55.

二层面是群体之间的社会流动,即底层群众—精英阶层流动,主要是阶层性流动,社会流动主要包括精英取代与精英流动两个方面。

吉登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流动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代际传递的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大大小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代际传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代际传递其根本性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优势主要通过继承教育优势来实现。

社会流动主要从动态角度来研究阶层分化的方向、动力和速度。王春光指出,社会流动影响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变动,社会阶层结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流动。国外社会流动理论研究相当丰富,但研究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基础上,在中国运用西方社会流动理论,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运用。

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研究。社会变迁加速会引起社会流动加剧和频繁,社会流动的频繁和加剧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以及阶层变化深刻显现出我国社会变迁历史进程,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经济变革的相当重要的内容。

社会流动与社会转型的研究。社会流动反映微观层面上内在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转型反映的是宏观层面上社会宏观结构的变化。王永进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流动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社会流动呈现出情距现象,向上的社会流动趋势增强,社会流动出现多元并存或二元交替的状态。刘祖云指出社会流动程度与社会转型程度呈正相关,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直接对社会流动的状况产生影响。

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的研究。代内流动是指一个人的最终状态与起始状态相比较而呈现出的地位变化,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社会状况变化。程丽香通过对福清市 18 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福清人就业意愿发生巨大变化,更多是背井不离乡,代内流动非常频繁且大多向上流动,流动方向大多为第二、三产业。代际流动是将自己的职位与上一代(父亲或母亲)同一年龄段相比较而体现出的地位变化,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都包括在内。严善平通过对天津居民研究发现,大多数职业存在着同职化倾向,而对于地位声望较高的职业其社会流动性大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反应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有着重要影响。郭凡通过对广州代际流动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广州经济开放程度大于政治程度,间接

---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P1.

张仁信.农民社会流动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的探讨[J].辽宁经济,1997(12),P1-2.

王永进.试析当前转型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6(1),P1-3.

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5),P1-7.

程丽香.沿海农村的社会流动—来自福建省福清市 18 个村庄的调查[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3),P1-6.

严善平.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0(3),P1-12.

反映了广州的社会开放程序。

农村的职业、区域流动的研究。农村的社会流动既包括从一种社会阶级地位向另一种社会阶级地位变化,也包括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发生转移,以及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进行转变。我国农村的社会流动主要分为行业间水平流动、行业间向上流动和混合型流动3种。农村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户籍制度的变化、城镇化加速、城乡二元结构及比较利益,这些变化促进了农村社会流动,体现出向上流动的趋势,同时反应了我国社会变迁进程。

社会流动与教育的研究。教育是个体知识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巨大。城乡二元制度以及农村物质条件差,农村教育水平低下,教育设施薄弱,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一直是限制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刘恩民认为教育可以实现个体的向上流动,并进而实现社会整体流动。陆学艺认为,广大学者就教育和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具有密切联系并已经达成共识,布劳·邓肯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阐述了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具有重大影响。周作宇指出,教育对于社会流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个人接受教育与考试等是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科普塞特等人认为,社会流动与城市化、工业化等过程密切,社会流动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仍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并认为教育是影响一个人生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将这种关系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1、教育获得的差异性主要归因于子女家庭地位的高低,那些高地位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正规的学校教育;
- 2、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多的从事非体力的劳动;
- 3、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大多数也在体力劳动部门工作,非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多数也在从事非体力的劳动,只有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从事非体力劳动;
- 4、家庭背景对教育和职业生涯的影响十分重要,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子女不仅能够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而且可以得到现实而有帮助的职业劝告;
- 5、出生农民家庭和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接受的职业劝告很少,且这样的过程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形成社会流动障碍。

马奇等人认为,资本、权力和文化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处于经济社会地位上层的人,其子女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将主要受其父辈的影响,通过代际传递获得的资本的稳定性比其他任何职业流动都更加重要;布迪厄

---

郭凡.当前广州社会的代际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5(6),P1-8.

刘恩民,彭泽平.教育、阶层背景与社会流动[J].沈阳大学学报,2008(4),P1-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P197.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406.

李运涛.蚁族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则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继承而得来的语言和文化的能力。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在国家或某个地区进行宏观展开,而很少对微观、较小的群体或个体进行研究,且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具有一定差异性,加大对社会流动的微观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 第三节 农民工

### 一、农民工的由来

#### (一) 何为农民工?

农民工问题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已经有了多年历史,专家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已经解决了部分问题,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的这个术语本来就是带有歧视的是不合法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也应该与世界的称呼一样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称呼,而根本就不存在农民工这一说法,认为有关于农民工的研究都已经结题。作者之所以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的,首先,由于受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这个群体确实存在并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其次,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现在呈现出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促使农村居民放弃耕种而到城市务工,按照目前的情况判断,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而“农民工”群体将还存在一定的时间;最后,“农民工”的称呼虽说有一定的不妥之处,但是此种称呼确实能够比较贴切的反映此群体的真实情况,即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的农村居民,但是他们从事的确实是非农产业的工作,且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包括国务院的文件都是使用的“农民工”这一称呼,约定俗成。

传统的农民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传统定向的乡下人,他们大多数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他们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大部分是自己消费的,因此,传统的农民和自给自足的农产品生产者是一个意思。不同的领域对农民的定义不同,但是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对农民进行定义,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

所谓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集矛盾的双重身份于一体,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即为农村居

---

李运涛. 蚁族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艾弗利特, 拉伯尔. 乡村社会变迁[M]. 王晓毅.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民,但是其从事的又是非农产业的工作即为工人,因而为了贴切的反应其真实的现状,他们有一个特有的称呼“农民工”。

## (二) 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产生的影响

户籍制度原本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的一种户口管理制度,但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出生、死亡、常住、暂住、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自由迁徙期阶段;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严格控制阶段;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阶段。农民工的变化与发展与户籍制度的三个阶段紧密相联。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按照家庭成员关系和地域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根据地理位置和血缘继承关系把户口划分为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厚厚的围墙,带有比较严重的歧视性,是对本来平等公民身份划分为不公平等级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关门”现象的出现,减缓了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人口的转移及农业现代化形成体制性障碍,不利于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城乡割裂进一步加剧,城乡统筹遭受阻碍,社会分化加剧。

## (三) 中国经济体制对农民工产生的影响

伴随中国户籍制度变迁而来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变,在这种变化下农民工产生与发展起来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的调动起来,进而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资源的有限性,使过去隐形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并逐步增大,较高的城市预期收益和农业比较收益偏低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的对巨大劳动力吸引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可能条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有经济吸引力的城市打工,农民工便在这时开始出现。在传统关系网络的支撑下,“三缘”关系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直至1980年便开始出现“民工潮”。

## 二、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在农民工社会流动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王春光、李培林、翟学伟、李强、边燕杰、李汉林、马戎等人。

### （一）政策二元分割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

农民工社会流动问题再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阶段性、保守性、渐变性等特征，是城市性滞后于工业性的结果。

目前，受转型时期的二元制度及其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都只是处于水平流动层面，缺乏跨越阶层边界的向上流动。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上，他们成为了典型的“边缘人”，大多数游离于城市正式的制度之外。中国目前农民工流动绝大多数为水平流动，缺乏垂直的向上流动，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却未能实现转换和提高，比如缺乏应有市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等。

由于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制度环境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农民工却难以享受现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政策，农民工子女难以在城市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等。

### （二）人力资本相关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

人力资本亦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之一。个人社会流动受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在其实现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获得的机会中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职业获得、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由于城乡二元制度以及其惯性的影响，限制了农民工群体及其子女在后致因素方面的发展。农民工要想提高自己的职业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因素就成为了关键性的因素。然而人力资本的获取主要是靠人们对技能、知识等方面的投入，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其流动的意愿越强烈，改善其职业和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实现垂直流动的机率相应就越大。相反，如果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农民工则难以实现社会转变，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和服务的步伐，其社会流动的幅度就易受到制约或者陷入低水平的循环或者只能水平流动甚至止步不前直至被社会淘汰。目前，农民工整体的人力资本不高，处于相对劣势状态，这就限制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使其社会流动处于水平流动状态难以实现垂直流动。

---

刘红燕.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A]河北学刊.2012(1)

### （三）社会关系相关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资本也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社会的群体性决定了人们之间必然以各种各样的关系形式存在，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人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体通过社会联系社会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即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关系，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依靠传统的“三缘”关系社会网络，这不仅可以是节约成本的一个好的选择，而且是农民工心理上认同的选择，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因缺乏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社会关系网络呈严重的单一化状态，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同质性强，这种同质性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给农民工带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中的优势资源。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与“内循环”的局限性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阻碍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同样，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与“内循环”的特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又必然会因为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而难以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的相对隔绝的弱联系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疏离感和认同危机而选择“内驱化”的社会交往模式，进而农民工的传统“三缘”社会关系网络得到了巩固与加强。

### （四）社会融入、排斥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

社会融入来源于经典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利维特斯（Levitas）提出了社会融入的三种基本策略，即资源再分配模式（Redistributionist Discourse）、道德模式（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与社会融合模式（Social Integrationist Discourse）。作为一个由农村流入城市且不断扩充的外来社会群体，农民工虽然改变了自己居住的空间位置，但却远未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角色转变，主要是受到了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等制度影响以及经济收入低、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低的影响。根据分析视角的差异，朱力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提出了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适应问题；米庆成提出了城市的归属感问题，指出农民工对城市存在地域上的强认同和群体上的弱认同；王春光提出了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郭星华等运用社会距离理论，“通过考察行动主题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的感觉”，通

---

边燕杰.张宏文.找回强关系[J].国外社会学.1998(2)

刘建娥.从欧盟社会融入政策视角看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 2010(11).

丁宪浩.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财经科学.2006(10).

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 2005(3).

米庆成.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探析[J].青年研究, 2004(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11(3).

过测量发现,第一代农民工是因为制度原因的非自愿隔离而新生代则是非制度原因的自愿隔离。Gans 对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直线型融合”进行批判后提出了“曲线型融合”的研究范式。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排斥、政策二元分割四个维度对农民工进行的研究,本文也将借助这四个维度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

郭星华, 储卉娟. 从乡村到城市: 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 江海学刊, 2004 (3).

## 第三章 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思路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农民工社会流动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但是不管是学术界对农民工的研究还是政府出台的与农民工有关的政策都是从宏观或中观的层面出发的。很少有从微观层面对农民工进行的研究，很少有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工个体，也很少有研究从小人物的角度去关注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作为小人物的“农民工”的话语权。不管是学术界专家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结论，还是政府出台的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性文件，它们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贴近农民工的真实现状，是否具有实践性，最具有发言权的或许就是农民工自身。

农民工社会流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实问题，农民工内部业已出现分化，一些农民工已经在务工城市以个体户经营为生，那么以其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为节点，其流动到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的生活轨迹是什么样的呢？

### 第二节 解决思路

####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拟采取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对研究对象口述资料做深入内容分析，关注作为农民工自己认为对他们自身社会流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本论文预计达成以下目标：

- 1、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描述性的记录农民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的大事，记录农民工所关注的发生在自己家庭的大事，为农民工这个群体保留鲜活的一手资料。

- 2、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根据深度访谈得到的农民工口述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发生的大事详细材料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以及处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家庭最为重视的是哪方面的事件，并做出笔者自己的诠释。

- 3、运用研究工具中文情绪字词表对口述者口述过程中出现的情绪进行分析，力图探讨不同事件对农民工的情绪激活程度，辅助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

素。

## 二、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家庭是依托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的“我看·成都生活”、“我看·锦江生活”两个项目选取的，此两个项目均是关注外来务工人员是怎么看待成都的，即在外来务工人员眼中他们务工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我看·成都生活”是爱达迅社会工作中心在成都市青羊区开展的影像志活动，有9个家庭参与到该项目中，“我看·锦江生活”是爱达迅社工中心在锦江区开展的影像志活动，一期有35个家庭参与到此项目中，二期有18户家庭参与到此项目中，两个项目一共有62个参与家庭。两个项目在选取参与家庭的时主要参照以下标准：1、家庭成员拥有农村户籍；2、举家外出务工；3、来成都市务工5年以上。

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到爱达迅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的两个影像志项目中，深受启发，决定毕业论文写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笔者对参与到爱达迅开展的影像志活动中的62个家庭进行跟踪了解后，为了保证研究的连续性，笔者将爱达迅社工中心服务开展的项目选取标准中第3条调整为10年以上，选取几个被访家庭进行深度访谈。笔者按照以下四个限定条件选取本论文的研究家庭：

- 1、家庭成员拥有农村户籍；
- 2、外来务工家庭必须是来S市务工十年以上的家庭；
- 3、必须是已婚且有孩子的家庭；
- 4、举家来S市务工。

本文之所以设立以上四个限定条件来选取研究家庭并不是力图代表所有农民工群体，而是代表农民工内部分化后的某一种类型。本文选取的研究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进行社会流动，即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职业上从务农工作向非农工作流动，阶层上从较低收入的农民阶层向较高收入的非农民阶层流动等。之所以设定“家庭成员拥有农村户籍”为限定条件是因为本文是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只有具有农村户籍才可能成为农民工；设定“外来务工家庭必须是来S市务工十年以上的家庭”为限定条件是因为本文用的是口述史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才会有比较丰富的生活轨迹，才会产生具备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设定“必须是已婚且有孩子的家庭”为限定条件是因为本文以农民工家庭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能够更好的反应其代际以及代内社会流动受到的影响因素；设定“举家来S市务工”为限定条件是因为本文的基本研究单位是农民工家庭，只有举家来S市务工才能更全面的反应其流动的轨迹以及流动过程中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加大代表性，研究对象在青羊区、锦江区、温江区 3 个地方选取。笔者将在城市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视为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将有稳定的收入且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视为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最后选取的研究家庭为：锦江区家庭 A、B，A 家庭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均未实现向上流动；B 家庭的经济地位正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社会地位处于水平流动阶段。青羊区家庭 C，经济地位已经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地位的实现则寄希望于子辈来实现；温江家庭 D，经济地位已经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子辈社会地位已经实现向上的流动。

笔者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选取的四个家庭口述资料进行研究，借助内容分析法等对四个家庭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选取的四个家庭的口述资料。

### 三、研究思路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特殊群体的口述资料，中心议题是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通过口述史方法表达出来的影响因素。为了能够得出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由于作者受人力、能力以及客观因素的限制，最终只在 S 市选取了 4 个家庭作为本论文的典型代表并以他们的口述资料作为分析的重点。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文献以及访谈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的同时，借助社会学社会流动等相关理论对影响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因素进行阐述，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发现影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

### 第三节 论文主要创新点

虽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农民工问题，但是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宏观和中观的角度。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从中观的角度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排斥、政策二元分割四个方面。同时，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主要是以个体为研究主题而不是以家庭作为研究单位，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引入农民工研究的也存在，但是主要是集中在农民工维权、社会融入与排斥、社会性别等方面，很少有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更没有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针对上述研究中的问题，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方面做一些探索。

(1) 在研究视角方面：本论文没有像以往大量的关于农民工研究一样从宏观或者中观的层面对农民工进行研究，而是从微观的角度，以农民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进行的研究设计，能够较好的研究作为小人物的农民工他们所关注的与

自身有关的影响因素。

(2)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是立足微观层面的研究，但是关注的又不是单纯的农民工个人，而是以农民工家庭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以家庭当中的某一个人作为主要的口述对象，对其口述资料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分析，以期得出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3)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是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口述史最初是历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发展到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界确实不多。有一些是对农民工进行的类似于口述史的研究，但是研究视角是社会性别或者法律等方面，综合而言本文是对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进行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的探索。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介绍

###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质性研究方法，口述史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的运用到多门学科研究中，本文借助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完成本文研究。

口述史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口述史具有人事记载的平民化、记载的细节化、载体的多样化、史料组合的系统化等特征。口述史资料，是主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口述史可以形象生动的记录整个事件的经过、结果及细节，可以获取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无法获取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又是如此的重要，正如同我们熟悉地上的林木，却很少知道深埋地下的根须，口述史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现了事件的“根须”和“细节”，帮助我们认识作为一棵完整植物的全部，找出影响时代变化的日渐腐朽的地下根须。

借助口述史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可以借助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样化的记载方式真实生动地记录农民工的生活实情，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他们对世事百态的看法，如果没有口述史的深度访谈，农民工于后人来说也许永远只是过眼云烟，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踪迹，我们的后人也不会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收集资料阶段的描述性记录，不仅可以为笔者收集到具有研究价值的一手资料，而且还可以为后人的研究保留鲜活的一手资料。笔者根据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做出自己

的诠释有利于让世人更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同时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农民工的历史面貌。

口述史研究方法是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关注的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农民工。本文选定4个举家外出务工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家庭，研究家庭成员口述其来S市务工十多年中对其家庭来说的大事，并以其口述的大事为主线进行深入的访谈以收集本论文研究的一手资料，结合关键词词表和中文情绪字词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所得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

## 二、研究工具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大事记、关键词词表、情绪字词表等六类研究工具辅助研究方法完成本论文的研究得出本论文的研究结论。

1、文献法。文献法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研究都要做的一个前期的准备，其难度在于如何在浩瀚的文献资料当中选取适合于研究者此次研究目的的资料，并对其所选取的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运用。本文的文献研究法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主要是对社会变迁视角下的社会流动理论的文献收集与分析；第二部分为国家出台的有关农民工政策文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收集与梳理；第三部分为口述史有关的文献收集与分析，主要梳理出口述史的变迁以及口述史在社会学和农民工中的研究运用。

2、访谈法。访谈法是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主要辅助性研究工具，笔者的访谈是在导师指导下并以访谈提纲为引导分多次进行。第一次与被访者访谈是以得到本研究所需的大事记为主进行的，后续的访谈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大事记结合访谈提纲进行的。本文的访谈提纲是以大事记为脉络，包括每件大事的应对、经过与结果几个方面，前几次访谈后都会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对访谈提纲进行调整得到最后的访谈提纲。本文的访谈是与被访者面对面的交流，在访谈提纲的引领下结合大事记进行访谈，每次的访谈时间都没有特别的限制，根据被访者描述自己家庭的每件大事为脉络，笔者进行引导与深度挖掘得到本文所必须的研究资料。每次访谈笔者会带上访谈提纲、情绪字词表以及关键词词表作为辅助性的访谈工具，且每次访谈都会在征得被访对象同意后录音，访谈结束后尽快将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资料，成文的文字资料、情绪字词表中的记录、录音资料三者构成了本文研究所需的原始资料。

3、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本文的内容分析是借助关键词词表以及情绪字词表完成的。本文的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对大事记、口述者口述过程中出现的情绪、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力图通过内容分析找出

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以及处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家庭最为重视的是哪方面的事件。

4、大事记。本文的大事记主要是作为深度访谈的线索,以及大事件的内容分析,本文的大事记主要是分两步得到。首先是让被访谈对象回忆在来S市务工的十多年来,被访谈对象整个家庭发生的大事,无所谓好坏,并回忆每件大事发生的年份,得到农民工家庭赋有年份的大事件;然后根据被访谈对象对事件的主观评价进行1—5分的赋值,1分为最差,5分为最好,依次分数增高事件变好,整个过程中均是被访谈者的主观评价,笔者除了介绍方法外不做过多的干涉。按照此方法得到赋有年份、分值和事件的大事件资料,即为本文的深度访谈辅助工具大事记。

5、关键词字词表。学术界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排斥、政策的二元分割等方面,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不仅仅是指其经济地位的流动还包括其社会地位的流动,本论文是对农民工流动的口述史进行研究,分析出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根据研究设计与前期的文献分析以及口述资料,本论文的关键词字词表是指在以访谈资料为原始资料的前提下,结合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政策的二元分割四个大的方面的若干个小方面为关键词,然后对每个关键词在每件事情的过程、应对、结果阶段出现的频次等进行分析,以期帮助研究结果得出。根据前期的访谈资料反馈以及文献综述把关键词分为四类,分别按照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码,即1社会关系网络因素,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3社会融入与排斥,4政策二元分割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分为6类,同样用阿拉伯数字对其进行编码,即1.1朋友、同学,1.2生意伙伴(同事),1.3家人(亲戚),1.4老乡,1.5房东,1.6信仰。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编码,即2.1教育、培训,2.2知识、技术,2.3资历、工龄,2.4经验,2.5能力,2.6健康。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社会融入与排斥因素进行编码,即3.1经济,3.2政治,3.3社会关系,3.4文化,3.5福利制度,3.6社区活动。由于政策的二元分割因素方面涉及面较广,共划分了8个小类,按照同样的方法编码,即4.1户籍(户口),4.2社会保险,4.3商业保险,4.4租房、廉租房,4.5购房,4.6教育,4.7医疗健康,4.8政策扶植。

在以上分类并编码的基础上记录每种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按照此方法得到的关键词字词表如表3-1所示:

表 3-1

	关键词	出现次数
1、社会关系网络	1.1 朋友、同学	
	1.2 生意伙伴（同事）	
	1.3 家人（亲戚）	
	1.4 老乡	
	1.5 房东	
	1.6 信仰	
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2.1 教育、培训	
	2.2 知识、技术	
	2.3 资历、工龄	
	2.4 经验	
	2.5 能力	
	2.6 健康	
3、社会融入与排斥	3.1 经济	
	3.2 政治	
	3.3 社会关系	
	3.4 文化	
	3.5 福利制度	
	3.6 社区活动	
4、政策二元分割	4.1 户籍（户口）	
	4.2 社会保险	
	4.3 商业保险	
	4.4 租房、廉租房	
	4.5 购房	
	4.6 教育	
	4.7 医疗健康	
	4.8 政策扶植	

6、中文情绪字词表。本文所用的中文情绪字词表主要是借助中文情绪字词表（Chinese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中的各种情绪形容词编制而成，用来描述被访谈对象在描述大事记中的具体事件时出现的情绪，帮助还原某一件大事在访谈者心中的真实感受。本文的情绪字词表借助中文情绪字词表（Chinese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将比较容易出现的情绪分为烦躁类（F）、正面情绪类（HE）、伤痛类（PS）、愤恨类（AH）四类，然后将属于各类的形容词按照类属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码所得的情绪字词表，如 F1 与心烦意乱的相对应，F2 与烦躁的相对应，按照此编码方法完成本文所需中文情绪字词表的编码，如表 3-2 所示：

表 3-2 中文情绪字词表 (CMACL)

项目	编码	项目	编码	项目	编码	项目	编码
心烦意乱的	F1	欢畅的	HE1	伤心的	PS1	狂怒的	AH1
烦躁的	F2	快乐的	HE2	忧伤的	PS2	愤恨的	AH2
焦躁的	F3	欢欣的	HE3	哀伤的	PS3	愤怒的	AH3
厌倦的	F4	快活的	HE4	悲哀的	PS4	恼怒的	AH4
消沉的	F5	高兴的	HE5	痛苦的	PS5	憎恶的	AH5
迷惘的	F6	欢喜的	HE6	心痛的	PS6	气愤的	AH6
焦虑的	F7	开心的	HE7	哀愁的	PS7	怨恨的	AH7
愁闷的	F8	兴奋的	HE8	懊悔的	PS8	仇恨的	AH8
抑郁的	F9	舒畅的	HE9	恐慌的	PS9	惊慌的	AH9
厌烦的	F10	热切的	HE10	哀怨的	PS10	生气的	AH10
闷闷不乐的	F11	愉快的	HE11	幽怨的	PS11	暴怒的	AH11
烦闷的	F12	激昂的	HE12	疑惧的	PS12	惊愕的	AH12
忧虑的	F13	惊喜的	HE13	惶恐的	PS13		
惘然的	F14	狂喜的	HE14	内疚的	PS14		
焦急的	F15	昂扬的	HE15	遗憾的	PS15		
烦恼的	F16	激动的	HE16				
郁闷的	F17	亢奋的	HE17				
难受的	F18						
不满的	F19						
憋闷的	F20						
坐立不安的	F21						
气馁的	F22						
烦乱的	F23						
别扭的	F24						
疑虑的	F25						
失望的	F26						
心神不安的	F27						
不安的	F28						
抵触的	F29						

表 3-2 中字母代表的单词：CMACL ( Chinese mood adjective check list )、F ( Fidget )、HE ( Happy and excited )、PS ( Pain and sard )、AH ( Angry and hate )。

## 第四章 四个家庭的十年：基于大事记的轨迹分析

### 第一节 四个家庭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论文立足于对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进行口述史研究，由于本人能力以及精力的限制，仅选取 S 市的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在 S 市选取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S 市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有大量的农民工群体；其次，S 市相对于西部的其它城市与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差距更小，研究结果更具有推广性；最后，笔者为四川人，对 S 市较为熟悉，可以省去部分的人力与财力。

为了研究的需要选取的外来务工家庭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家庭成员拥有农村户籍；2、外出务工家庭必须是来 S 市务工达十年以上的家庭；3、必须是已婚且有孩子的家庭；4、举家来 S 市务工。本文的被访谈农民工家庭总共有 63 户，62 户为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影像志活动的参与家庭，1 户为笔者比较了解的另外 1 户家庭，但是只选取了其中的四个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

被研究对象分别是锦江区两户农民工家庭，青羊区一户农民工家庭，温江一户农民工家庭，分别记为家庭 A、B、C、D。

锦江区其中一户农民工家庭 A，家庭人口共有 5 人，均为达州市渠县人，家庭成员为女性的父亲（母亲已经去世）、夫妻两人、女儿、儿子。女性为家中独女，母亲于 2003 年患癌症去世，老父亲现在与夫妻俩一起居住在 S 市，在 S 市街上擦鞋，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收入并不给夫妻俩。家庭男性为上门女婿，即婚后随妻居，男性在家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和弟弟，男性父母在老家与弟弟住在一起，男性每年春节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回家看望父母。夫妻两人均为小学文化，小学毕业后来 S 市学习理发，属于师傅带徒弟形式，夫妻俩是一起学习理发的师兄介绍认识。恋爱结婚后便开始筹划自己开店，但是由于技术与资金的限制，最开始只能够在街边放一面镜子就开始摆地摊理发，后来筹集到一定的资金，技术也练得好一些便开始开店经营。目前，夫妻两人都是理发师，夫妻开了一家小型理发店，家庭买了一辆以经营性用车为主的面包车，只要不限号男性现多以跑车赚钱为主，限号或者是没有生意的时候男性仍然在理发店理发。两个孩子都出生在 S 市并一直在 S 市成长，大女儿现在在 S 市上初中，小儿子两岁多，家庭暂时没有在城市买房，没有在务工城市购买社会保险，在农村户籍所在地购买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农村医疗保险。

锦江区另一户被访谈家庭 B 来 S 市已经 16 年了，家庭成员共有 6 人，均为遂宁人，家庭成员为女性的父亲、母亲、夫妻两人、儿子、女儿。女性在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全家因为修建三峡水电站移民到湖南，父母与女性一起居住，母亲现年 69 岁，为初中文化，体弱多病经常吃药，现居住在遂宁市购买的住房中照顾读高中的女儿，父亲在 S 市与其住在一起，父亲现年 70 岁，以前是砖瓦匠，现在身体健康，平时在街上收荒，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男性为上门女婿，在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弟弟，父亲为老国企退休职工，每个月有较高的退休工资，母亲为普通农民，父母在老家独自居住。夫妻俩人都是小学文化，夫妻俩人通过老家的人介绍认识。女性 13 岁随老乡到 S 市学习缝纫，学成后在老乡的制衣厂工作了很多年，结婚后与老公一起做生意，老公在菜市场做干杂生意，自己在菜市场卖鲜花，但是由于缺乏做生意的能力，生意无法经营，女性现在在自己租住房屋的楼下摆摊做缝纫，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男性以前自己开店维修家电，后来又跑到建筑工地当木工和电焊工，后来眼睛患血管瘤治疗后视力比较低无法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现在没有固定工作，以做展台和收荒为生。大儿子高中未毕业便辍学打工，现为一名修车工，小女儿在老家遂宁市读高中，B 家庭在遂宁市区买有一套一百余平米的住房，没有在务工城市购买社会保险，在农村户籍所在地购买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农村医疗保险。

青羊区的一户农民工家庭 C，此户人家来到 S 市已经有十多年了，家庭成员有三人均为绵阳人，分别是夫妻两人、女儿。女性为家中的独女，婚后随夫居，女性在 14 岁到 S 市学习美容，后因熟人介绍与丈夫相识，婚后夫妻俩到广东打工。男性在家中排行第五，家中共有 7 个兄弟姐妹，以前家境困难，父母现在在老家与弟弟居住在一起，夫妻两人经常回家看望父母。在广东打工多年后决定回到 S 市做餐饮，由于受资金的限制，刚开始只能摆地摊且经常被城管追赶，女性怀孕后便开始租店铺经营，现在的店铺是夫妻俩搬迁第四家钵钵鸡店铺，夫妻两人带动了很多亲戚各自经营钵钵鸡店。女性的父母均是普通农民，现在与夫妻俩一同居住在 S 市，在夫妻的餐饮店帮忙，夫妻俩的独女出生并成长在 S 市，目前在 S 市上小学 3 年级。夫妻俩人在 S 市区有两套一百余平米的住房，一辆家庭轿车，在农村户籍所在地购买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农村医疗保险，并在务工城市购买商业保险。

温江区农民工家庭 D 来 S 市已经有 18 年，家庭成员共 4 人，均为达州市渠县人，分别是夫妻两人与两个女儿。夫妻两人通过媒婆介绍组建家庭，夫妻双方均是小学文化。男性在家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均为建筑包工头，妹妹在广东务工，各自均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父母均为普通农民，母亲没有上过学，父亲为小学文化，当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和村长，目前在老家

独自居住。女性在家排行老二，家中有哥哥、妹妹，均各自组建家庭，父母在老家与哥哥一起居住。男性以前做过很多生意，但是最后都亏本，还欠下不少贷款，后来独自到福建打工偿还部分贷款，后到 S 市做建筑包工头，贷款早已经偿还完。男性现在仍然是建筑包工头，女性为超市导购员，目前在 S 市买了 130 余平的住房一套和店铺一间，家用轿车一辆，没有在农村购买新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仅在务工城市购买了商业保险。两个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大女儿为公务员，小女儿为小学教师。

## 第二节 四个家庭的大事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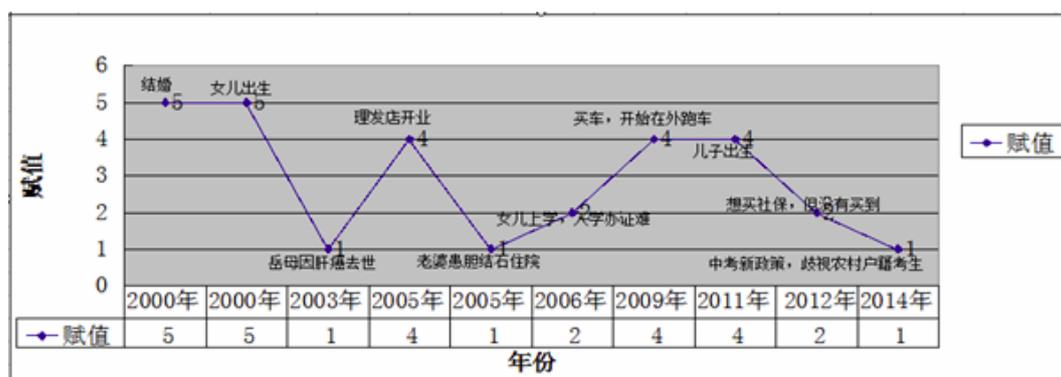
### 一、大事记的内容

农民工家庭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指农民工家庭到 S 市打工后发生在自己家庭的大事，并对每一件大事进行 1—5 分的赋值，即 1 分为最差，5 分为最好，从 1 分到 5 分事件依次从坏到好转变，每个家庭的大事记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别，且同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家庭中赋值也可能不同，由每个家庭描述者的主观评判决定，家庭的大事记以及分值均由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描述者口述，笔者记录。大事记也是本研究继续深度访谈获取资料的主线，笔者根据大事记中的每一件大事进行一次深度访谈来获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本研究中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研究的客观性，会对每个家庭的大事记进行分析。

本论文的大事记由四个家庭的赋有年份和分值的大事件组成，每个家庭的大事记都可能包括家庭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但就本次笔者访谈到的大事记而言，主要包括了住房、子女教育与发展、医疗等几个民生问题。经整理，图 4-1、4-2、4-3、4-4 所示：

#### (一) A 家庭大事记内容

图 4-1 A 家庭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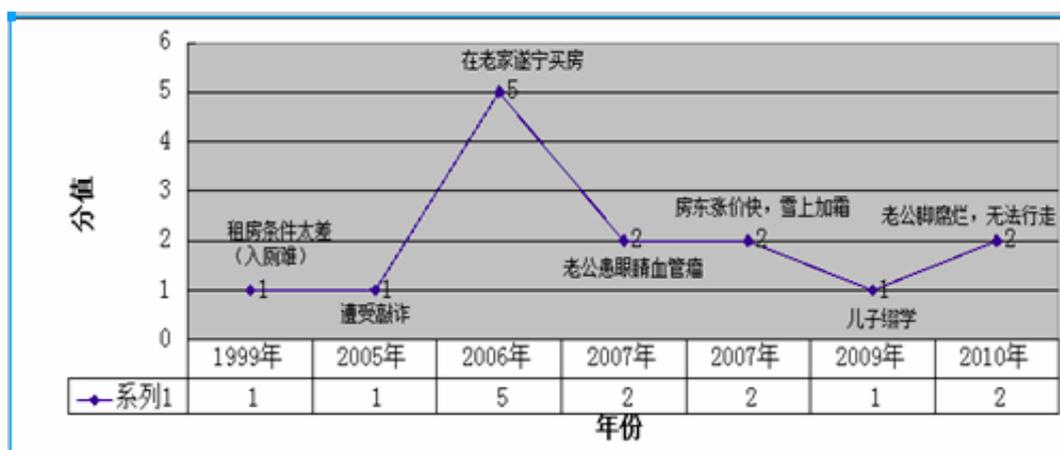


由图 3-1 可以看出，A 家庭的大事记比较多，一共有 10 件，且赋值的曲线变化比较大，从 1 分到 5 分变化，高分事件与低分事件的数量相等。家庭大事记的高分出现在组建家庭、孩子的出生以及生意的发展方面，最高分出现在结婚与长女出生，次高分事件则出现在两次生意的开始以及儿子的出生。最低分则是出现在亲人的生病与政策的限制方面，岳母去世与老婆生病住院均给予了最低分 1 分，政策方面的限制可以在家庭 A 的大事记中找寻到比较明显的线索，女儿上学，入学办证难（程序多、费时长、难度大），想买社保，但并未买到（找不到挂靠的公司，且儿子上学必须要有社保）家庭都给予了 2 分的低分，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 S 市中考新政策（同等条件下农村户籍的考生比城市户籍的考生多 30 分才能录取）的出台，口述者给予了 1 分的低分，口述者认为大家都是一样平等的人，不应该仅仅是因为户籍的不同受到如此大的差别对待。

A 家庭的高分事件有三件是与家人团聚有关，另外两件高分事件是与生意有关；低分事件有三件是与子女教育有关（想买社保主要是儿子上小学办证家长必须要提供本市社保），两件是与家人生病有关。笔者按照相似或相近事件划归一类原则将 A 家庭的大事件归结为四类，即家人（朋友）、生意、医疗健康、子女教育与发展。

## （二）B 家庭大事记内容

图 4-2 B 家庭大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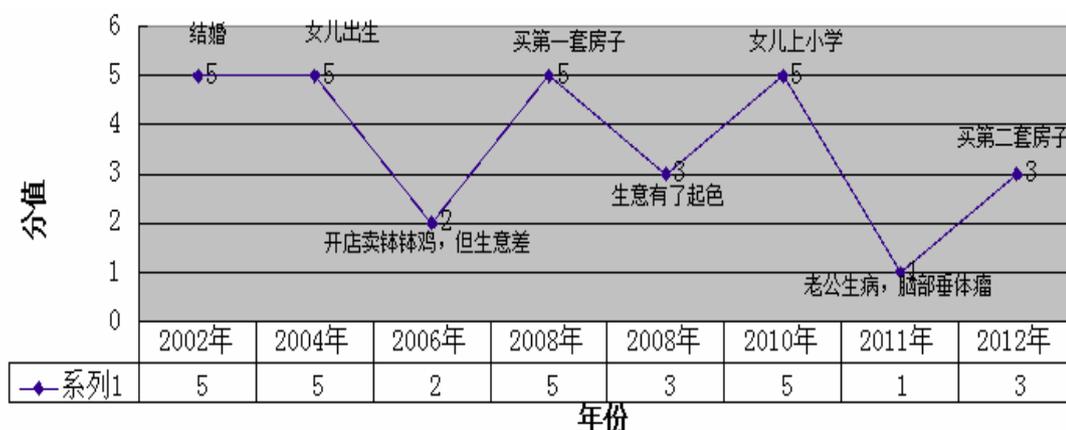
B 家庭举家来成都已经有 16 个年头，B 家庭大事件相比 A 家庭大事件相对较少。由图 4-2 可以看出，B 家庭来 S 市务工的十多年里发生的大事一共有 7 件，事件的赋值曲线比较平缓且分值都比较低，除了购买住房给予了最高分 5 分外，其余的均是 1-2 分的低分赋值。B 家庭的高分出现在 2006 年在老家遂宁市区购

买住房；低分则出现在租房、家人生病、遭受敲诈方面，最低分 1 分出现 3 次，分别是租房条件差，尤其是入厕难、遭受敲诈、儿子辍学三件事，次低分 2 分同样出现了 3 次，分别是老公患眼睛血管瘤、房东涨价快，雪上加霜、老公脚烂，无法行走三件事。从大事记的曲线以及分值可以看出家庭 B 来到成都似乎过得并不是很顺利，被访者能够记得起来的对自身家庭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多半是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事件。

B 家庭的高分事件仅有与购买住房有关的一件，低分事件出现了 6 次，分别与租房艰辛、遭受敲诈、家人生病、儿子辍学有关。笔者将家庭 B 的大事件按照相似或相近事件划归一类的原则归结为五类，即购买住房、租房艰辛、遭受敲诈、医疗健康、子女教育与发展。

### (三) C 家庭大事记内容

图 4-3 C 家庭大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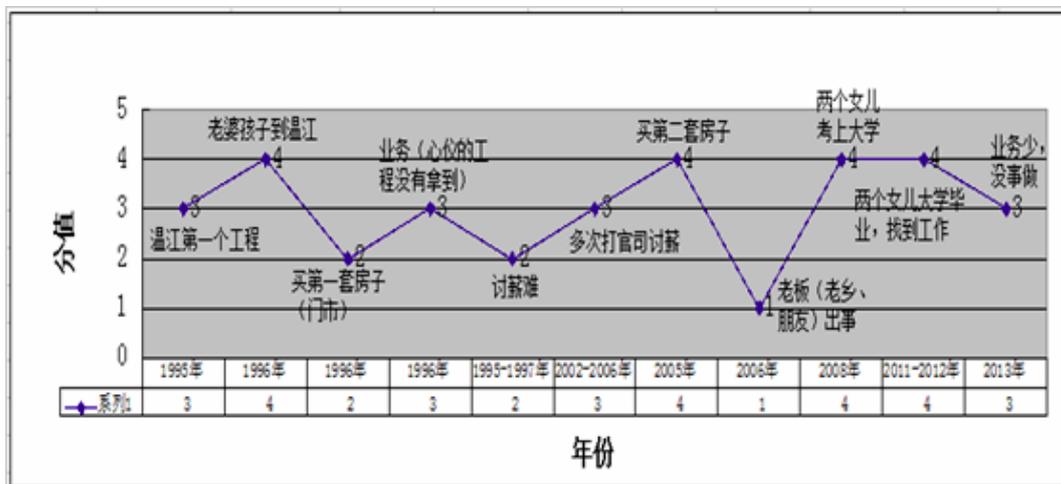


由图 4-3 可以看出，家庭 C 的大事件一共有 8 件，家庭 C 的大事记赋值曲线起伏比较大，从 1 分到 5 分变化但高分出现次数比较多，低分事件总数仅为大事件总数的四分之一。家庭大事记的高分多出现在组建家庭、子女、住房等方面，低分出现在家人生病，生意与住房方面。C 家庭大事记中最高分 5 分出现了 4 次，分别是结婚、女儿出生、购买第一套房子、女儿上学四件大事；3 分出现了两次，分别是生意有了起色、购买第二套房（按揭购买，办理社保比较麻烦）两件大事；低分 1 分、2 分各出现一次，即老公生病，脑部垂体瘤赋值 1 分、开店卖钵钵鸡，但生意差赋值 2 分。

C 家庭的高分事件有两件是与家庭团聚有关，一件与购买住房有关，一件与子女教育有关；中等分值事件 2 件，分别与生意和购买住房有关；低分事件两件，一件与医疗健康有关，一件与生意有关。笔者将家庭 C 的大事件按照相似或相近事件划归一类的原则归结为五类，分别是家人团聚、购买住房、医疗健康、子女教育与发展、生意。

#### (四) D 家庭大事记内容

图 4-4 D 家庭大事记



由图 4-4 可以看出，家庭 D 的大事记事件数比其他三个家庭的大事记都多，一共有 11 件，家庭的大事记赋值从 1 分到 4 分变化，呈交叉上升状态，起伏比较大。口述者在口述的时候最常说的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得啥子好说的，不像别人那样轰轰烈烈的做出了一番事业”。

从大事记的赋值中也可以看出，分数最高为 4 分，一共出现 4 次，第一次赋值 4 分是老婆孩子到温江团聚，第二次赋值 4 分是在买第二套住房（现在居住），后两次赋值 4 分则是两个同时女儿考上大学以及两个女儿同时毕业并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中等分值的事件出现了 4 次，第一件赋值 3 分的事件是温江的第一个工程、第二件赋值 3 分的事件是业务（心仪的工程没有拿到）、第三件赋值 3 分的事件是多次打官司讨薪，第四件赋值 3 分的事件是业务少，没事做；低分事件一共有三件，分别是赋值 2 分的事件即购买第一套房子（门市）、讨薪难，以及赋值 1 分的事件即老板（老乡、朋友）出事。

D 家庭的高分事件一件与家人团聚有关，一件与购买住房有关，两件与子女教育有关；中等分值事件均与生意有关；低分事件一件与购买住房有关，一件与生意有关（讨薪难），一件与老板出事有关。笔者将家庭 D 的大事件按照相似或相近事件划归一类的原则归结为五类，分别是家人团圆、购买住房、生意、子女教育、朋友出事。

## 二、大事记分析

在本研究中为了保证研究资料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生动性，笔者选取了 10 年以上的大事记进行深入的内容分析。根据研究主题和内容分析的需要，笔者将口述者口述的大事记涉及到的具体关键词进行了相关统计，细分 29 个为关键词，详情如“表 4-1”所示。

表 4-1 被访者口述大事记关键词

编码	关键词名称	编码	关键词名称
01	租房条件差	16	开店（2 次）
02	遭敲诈	17	买第二套房（2 次）
03	买第一套房（2 次）	18	女儿考上大学
04	脑瘤	19	眼睛血管瘤
05	房租涨价	20	业务（3 次）
06	儿子辍学	21	家人团圆
07	结婚（2 次）	22	讨薪难
08	女儿出生（2 次）	23	打官司讨薪
09	女儿上学	24	朋友出事
10	脚烂，医治困难	25	女儿毕业工作
11	女儿读书，办证难	26	岳母因肝癌去世
12	儿子出生	27	老婆患胆结石住院
13	理发店开业	28	买车，在外跑车
14	想买社保，但无法	29	中考新政策
15	老家买房		

在确定了大事记涉及的关键词以及数量后，笔者按照相同或者相似关键词归为一类的方法，对所有关键词做了进一步的归类处理，以便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详细归类情况可参见“表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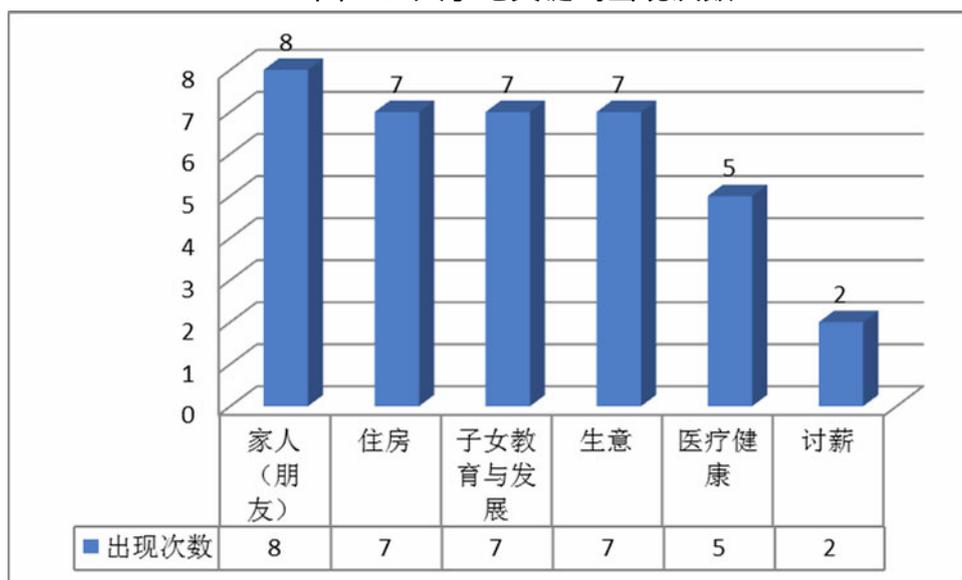
表 4-2

事件编码	类别名称	包涵的关键词序号
A	住房	01、03、03、05、15、17、17
B	子女教育与发展	06、09、11、14、18、25、29
C	医疗健康	04、10、19、26、27
D	讨薪	22、23
E	家人(朋友)	02、07、07、08、08、12、21、24
F	生意	13、16、16、20、20、20、28

归类方法如下：首先，笔者在四个家庭十多年的大事记中一共找到了 29 个关键词，通过对这些大事记做详细的分析并结合文献以及笔者的研究设计，把所涉及到的关键词按照相似词划归一类累计的方法进行统计和归纳；然后，将所得

到的 29 个关键词进行二次整合，按照事件的相似性，划分为 6 个事件类别，分别是【A.住房】、【B.子女教育与发展】、【C.医疗健康】、【D.讨薪】、【E.家人（朋友）】、【F.生意】，之所以做这样的分类与下一章节的访谈资料内容分析有密切的联系；再次，运用简单的数据统计以及分析方法，得出关键词的总数以及各小类关键词的总数和大类关键词的总数，以及在各类关键词的个数统计中所出现的频次等，事件出现的频率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大事记关键词出现次数



从图 4-5 可以看出，在四个家庭大事记归纳的 6 大类事件关键词中，家人（朋友）类大事件是出现次数最高的，出现了 8 次，住房类大事件、子女教育与发展类大事件、生意类大事件出现的次数也比较高分别出现 7 次，医疗健康类大事件出现了 5 次，讨薪类大事件出现 2 次。

家人（朋友）类大事件出现的次数最多，结合四个家庭的大事记赋值可以看出此类大事件赋值曲线起伏非常大，从 1 分到 5 分变化，此类大事件可以分为家人团聚与社会支持类，家人团聚类大事件赋值比较高，一般在 4 分到 5 分，社会支持类大事件赋值为最低值 1 分。

住房类大事件出现了同样是每个家庭都会出现的大事件关键词，四个家庭关于住房类的赋值变化也是比较大的，从 1 分到 5 分变化，住房类大事件可以分为租房和买房两类，租房类的赋值比较低为 1 分或者 2 分，购房类的大事件赋值比较高为 4 分或者 5 分。

子女教育与发展是每一个农民工家庭大事记都会出现的大事，大事记的赋值则出现了较大的起伏，从 1 分到 5 分变化，子女教育与发展顺利则会出现家庭大事记赋值的最高分，一旦子女教育与发展不顺则会成为家庭大事记赋值的最低分。

生意类大事件的赋值变化比较小在 2 分到 4 分之间变化,生意顺利则会出现家庭大事记赋值的较高分,生意不顺则会出现家庭大事记赋值的较低分,不管生意是否顺利都不会是家庭大事记赋值的最高分或者是最低分。

医疗健康类大事件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大事记赋值的曲线变化比较平缓且赋值比较低,在 1 分到 2 分之间变化,医疗健康类大事件一旦发生便会是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限制性因素。

讨薪类大事件出现次数比较少,一共出现两次,两次赋值分别为 2 分、3 分,讨薪类大事件在个体户中较少出现,而在建筑行业出现频率较高,在本文的访谈家庭中只出现在男性为建筑包工头 D 家庭中。

家人(朋友)类大事件,在图 4-1 中,两次最高分 5 分均是出现在此类大事件即结婚与女儿出生,另外一件赋值 4 分的事件也是此类大事件,即儿子出生;图 4-2 中赋值最低的大事件之一遭受敲诈这是出现在此类事件中;图 4-3 中两件赋值 5 分的大事件结婚和女儿出生则是此类大事件;图 4-4 中,赋值 4 分的大事件老婆孩子到温江与赋值 1 分的老板(老乡、朋友)出事均是此类事件。

住房类大事件,在图 4-2 中出现了 3 次,分别是赋值 1 分的租房条件差(入厕难)、赋值 2 分的房东涨价、雪上加霜,以及赋值 5 分的老家遂宁买房;图 4-3 中赋值为 5 分的购买第一套房和赋值为 3 分的购买第二套房均属于此类大事件;图 4-4 中赋值为 2 分的购买第一套房子(门市)和赋值为 4 分的购买第二套房属于此类事件。

子女教育与发展类大事件,在图 4-1 中出现了 3 次,分别是赋值 2 分的女儿入学办证难、赋值 2 分的想买社保,但没有买到(儿子入学父母必须提供社保才能办齐入学证件)以及赋值 1 分的中考新政策,歧视农村户籍考生;图 4-2 中赋值 1 分的儿子辍学属于此类事件;图 4-3 中,赋值 5 分的女儿上小学属于此类大事件;图 4-4 中有两件此类大事件,分别是赋值 4 分的两个女儿考上大学以及赋值 4 分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找到工作。

生意类大事件,图 4-1 中此类事件出现两次,赋值均为分值较高的 4 分,即理发店开业、买车,开始在外跑车;图 4-3 中此类事件出现两次,分别是赋值为 2 分的开钵钵鸡店,但生意差、赋值为 3 分的生意有了起色;图 4-4 中此类大事件出现了 3 次,赋值均为 3 分,分别是温江第一个工程、业务(心仪的工程没有拿到)、业务少,没事做。

医疗健康类事件,在图 4-1 中此类事件出现两次,赋值均是分值最低分 1 分,分别是岳母因肝癌去世、老婆患胆管结石住院;图 4-2 中此类事件出现两次,赋值均是分值比较低的 2 分,分别是老公患眼睛血管瘤、老公脚烂,无法行走;图 4-3 中此类事件出现一次,即赋值 1 分的老公生病,脑部垂体瘤。

讨薪类大事件仅在图 4-4 中出现了 2 次，分别是赋值 2 分的讨薪难和赋值 3 分的多次打官司讨薪。

家人(朋友)类关键词之所以能够在四个家庭的大事记中出现如此多的次数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一些看似业缘关系实质上是地缘关系，因为业缘能够有所交流的人群同时也是老乡，即业缘关系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为主，缺乏多样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家人团聚是四个被研究对象都十分重视的事件。其次，在人力资源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的缺乏以及能力的欠缺，使得农民工家庭会把家人(朋友)方面看得十分重要，当然这种家人(朋友)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然后，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内循环和封闭性，导致这种排斥是相互的，农民工在感受到城里人排斥的时候，会本能的选择与自己拥有亲戚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群交往。家庭发生什么变故也多是找这些人帮忙，心理上更容易相信这部分人，即使这部分人的观点、信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B 家庭在本市遭受敲诈事件最后也是靠家人解决的，并将遭受敲诈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是租房住的外地人。最后，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共同的农民工身份、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会让农民工群体因为有更多共同的遭遇而让大家因为有共同的话题而变得更容易沟通。

关键词住房类大事件在四个家庭中出现 7 次也是与这四个方面密切相关的。首先，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租房住的农民工居住的环境较差且居住群体单一以农民工为主，这也限制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购买住房的农民工居住环境有所改变，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有所拓展，但是还是以传统的强关系为主，购买住房以后就为家人在城市团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多限制，然而提高教育水平又是很多农民工子女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很多农民工子女面临入学难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并不以农民工居住地点为就近原则入学，而是要参加摇号入学，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甚至无法在父母务工的城市上学，但是购买了一定面积的住房并落户该区之后就可以参照就近原则入学制度，这是很多农民工购买住房时主要的考虑因素。然后，在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购买了住房的人受到的排斥小于租房住的农民工，租房住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会将购买住房的农民工视为城里人，B 家庭遭受敲诈就是一个例子；最后，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个方便都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大家很容易就能够感觉得到的，租房居住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

关键词子女教育与发展类大事件在四个家庭中出现了 7 次，经过笔者分析，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比较低的限制使得其社会关系网络也多是与自己同样教育程度的人群，这使得其社会关系大受限制，进而阻碍了其经济社会地位向上流动，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十分的重视，只要是子女读书成绩还可以农民工则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供养子女上学，期盼子女能够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实现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知识，技术、能力等均受到教育与培训的直接影响，农民工由于受教育年限较短，受正规的技术培训比较少，对新媒体运用等综合能力较差等原因使得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比较难，因而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希望子女能通过教育或培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从而改变现在的处境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的工作大都是很多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脏、乱、差的工作，大多数农民工居住的环境也比较差，很容易被城市人歧视，难以融入工作地点的生活环境；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虽然现在农民工子女办齐相关证件后可以在城市入学，但是其上学的学校多数是办学软硬件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工学校或者是要缴纳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高额的建校费等，以及异地中考、异地高考仍然会有很多的限制与不便，A 家庭将 S 市出台的中考新政策作为赋值 1 分的家庭大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即在笔者调研的 S 市 2014 年中考新政策规定同样条件下报考同一所高中，农村户籍考生需要比城市户籍考生高出 30 分才能被录取，口述者口述时十分愤怒的说都是平等的人，凭什么城市户籍的考生分数要低这么多，口述者的女儿出生与成长都是在 S 市，与普通的 S 市学生没有差别，但是却因为女儿是农村户籍就要高出 30 分才能被录取。

关键词生意类大事件同样出现了 7 次之多，要在城市真正的站稳脚就必须的有稳定的收入，成为个体户做小生意是大部分想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一个很好的选择。在社会关系网络因素方面，被访的农民工家庭口述者都提到过生意，都表示做生意必须要有熟人、要有关系才能够做得走，才能够赚钱，开理发店的 A 家庭口述者说自己的店铺不会搬迁，因为这儿很多熟人、朋友都来照顾自己的生意，社区管委会的人也都认识，老公跑车光顾的也多是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开缝纫店的 B 家庭口述者也表示到自己这儿修补衣服的多是熟人，爸爸收荒也很少到街上去转，多是熟人叫到家里去收或者熟人带过来卖；做小餐饮的 C 家庭口述者描述经常会有很多常客到店光顾；做建筑包工头的 D 家庭口述者更是说材料商、建筑承办商、工人更是与自己都是熟人、朋友。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技术和经验对于做生意十分重要，几个家庭的口述者都描述说自己技术比较好，又有十多年的经验，这是自己生意做的走的主要原因。在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农民工在做生意上会吃一些亏，提供同样服务的情况下，有关系的当

地人更容易获得大家的信任，促成更多生意的完成。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农民工会受到政策的一些限制，比如对政策的解读等方面以及投入有些行业会受到限制等。

关键词医疗健康类大事件在被访对象的大事记中出现了 3 次，经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血缘关系是农民工主要的社会关系网，家人生病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家人生病也只能靠亲戚等帮忙照料；其次，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健康是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多与体力相关，没有健康的身体是难以胜任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不仅无法在城市生活而且回到农村生活也会成为比较大的负担；然后，在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农民工本身就会受到经济市场的排斥，比如劳动力市场、收入与支出等的排斥，没有健康的身体本身就受到排斥，市场上其可以拥有的工作机会更受限制；最后，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医疗保险城乡统筹低，农村医疗保险保障层次低，且农民工多在外地打工，当其生病时一般就在打工所在地医治，外地医治回到老家能够报销的百分比十分低下，因而农民工在提及农村医疗保险时认为用处不大。

讨薪类关键词只出现在 D 家庭中，虽然有多次的讨薪但是还都是通过比较和平的途径解决，并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经笔者分析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社会关系网络是主要原因，D 家庭口述者口述建筑工人大都是其老乡或者是以前的工人的亲戚，老乡等，工人与包工头都是熟人；材料供应商也都是认识合作多年的熟人；工程也多是熟人、朋友、老乡介绍，包工头与老板之间也都是熟人；口述者 D 原话为“都是人家欠我的，我欠别人的，大家都是熟人，有钱钱打走，无钱话交代啥，我们话还是说到位了的，大家都是熟人也不会说多为难你，还是没有发生到处堵到不准走那些事情”。其次，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水平低、经验比较单一等的限制，从事新领域工作的难度较大，因而继续从事建筑工作的可能性大，只要老板最后能够把工资全额支付即可。然后，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农民工由于受到各方面的排斥能够从事的工作范围是比较有限的，相对来说建筑工人收入还算高，因而建筑工人会比较珍惜给熟人工作的机会。最后，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包括确保农民工的工资不被拖欠，D 家庭就 2 次通过打官司的途径来讨回被拖欠的工薪。

### 三、四个家庭大事记分析小结

社会流动反映的是内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变化，社会流动有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之分，代内流动是指一个人的最终状态与起始状态相比较而呈现出的地位变

化,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社会状况变化。代际流动是将自己的职位与上一代(父亲或母亲)同一年龄段相比较而体现出的变化,包括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社会流动同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联系紧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工作或者生意更多的是影响一个人的经济收入,然而传统的眼光还是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相对于经济地位而言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更难以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代内流动更多的是经济地位的提升,而社会地位的提升更多的寄希望于代际流动。农民工家庭的大事记显示出了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的事件,住房的购买以及医疗两类大事件既会影响代内流动又会影响代际流动以影响代内流动为主,如果无法在城市购买住房也就无法最终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医疗保障的不完善会限制农民工代内甚至是代际的社会流动,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原本就具有收入低且不稳定的特点,如若患大病时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那么不仅仅是治病所需大量的资金无法保障,可能连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陷入困境,从而整个家庭就面临向下流动的压力,在影响代内流动的同时,也给下一代的社会流动带来了阻力,导致代际间的向下流动。关键词中的大事件是受到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政策二元分割的交叉影响的。

家人、朋友(社会)类大事件,农民工由于这四个方面的交叉影响与限制,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主,这样的社会关系既因为现在的亲戚、朋友(社会)的帮助实现了目前的地位,又会因为将其交友圈限制在同质性群体中而阻碍其后面的发展。

能否在城市购买住房是一个农民工家庭能否在城市永居下去的一个硬性指标,在城市购买住房象征着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初步站稳了脚跟,农民工家庭有了在城市举家团聚的基本物质条件,农民工子女可以比较方便的在城市享受城市的教育条件、结交城市里的同龄朋友,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利于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大事件子女教育与发展出现在每个农民工家庭的大事记中,子女教育与发展在各个农民工家庭大事记中的赋值从1分到5分不等,口述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必须重视教育。A家庭更多的是关注与户籍挂钩的教育政策对子女教育与发展的影响,并认为农村户籍的子女在城市上学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B家庭的口述者认为儿子辍学后只能够走自己作为打工仔的老路,赚钱辛苦还被人看不起,儿子的社会地位仍然无法提高;C家庭口述者认为作为经济地位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夫妇俩对于独女在学习方面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在他们看来女儿除了读书外就是幸福的生活,虽然女儿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但是现在就期望女儿多读书毕业好

找一个社会地位高的工作；D 家庭中女儿考上大学口述者给予了 4 分的赋值，女儿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也给予了 4 分的赋值，连续两次赋值的最高分均与子女教育及发展直接相关，D 家庭在 S 市有住房有轿车，两个女儿大学毕业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得到提高，不管从代内还是代际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生意类大事件主要帮助农民工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当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能够在城市站稳脚并购买住房全家安居城市的农民工多是有自己的小生意的群体。有了自己的小生意之后首先实现了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然后购买住房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定居，实现了从农村居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变（至少在迁徙者老家农村的邻里是这样看待），但其是要成为民营企业企业家进一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则可能不是农民工自身这一代能够完成的。

医疗保险由于城乡的差别，会更一步加剧农民工的劣势地位，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只能够购买农村医疗保险，没有办法购买城市的医疗保险，当然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更是为数不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生病在务工城市医治，治疗费用基本上只能由农民工自己负担，回到老家医疗保险报销的额度很是有限，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劳保设施相对有限、且从事的工作需要付出一定强度的体力更容易生病，但是却不能够受到城市医疗保险的保障，这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风险，进而限制了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

讨薪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才会遇到的事件，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与用人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比较少，农民工很大一部分是在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家庭 D 中提到的讨薪难事件就是如此，自己与工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建筑方也没有真正按照合同支付工程款，到后面即使通过司法途径也只能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追回部分工程款。

笔者认为，类似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Two Factor Theory)，可以大致把家庭的大事记分为积极影响因素和消极影响因素两大类，积极的影响因素也可以大致理解为好的因素，可以帮助其实现向上流动的因素，消极因素也可以理解为坏的因素，会限制其向上流动甚至会导致其向下流动的因素。积极因素朝好的方面发展时人们就能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消极影响因素只有不朝坏的方面发展，才不会导致人们向下的社会流动。住房、子女教育与发展、家人团聚、生意可以归属于积极影响因素，只有这些方面的大事朝好的方面发展就能帮助人们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根据图 4-5 不难算出，这 4 类事件占大事记总数的 68%。医疗、讨薪、遭受敲诈、朋友出事则可以归属于消极的影响因素，即使不出现这些事件也不会有利于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一旦这些事件发生，那么就会对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产生阻力，事件严重时甚至会迫使农民工向下的社会流动。

## 第五章 四个家庭口述资料分析

### 第一节 口述资料的内容分析

#### 一、口述资料内容简介

本论文口述资料来源于笔者对四个家庭 A、B、C、D 的 10 多次深入访谈，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 10 多万文字资料为本论文内容分析的原始资料，访谈主要以大事记为主线进行，包括各个家庭来 S 市务工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本论文中，为了保证分析资料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以及时代性的特征，笔者对被访对象口述的大事件均作为本次内容分析的原始资料，最新被提及的事件包括被访家庭务工所在地 2014 年出台的异地中考政策。本部分既包括对被访者口述内容的分析也包括对被访者口述时的情绪的分析，关键词表与中文情绪字词表是本次内容分析的主要工具，本文设计的关键词字词表和情绪字词表在第三章研究工具中有详细介绍，具体如表 3-1、3-2 所示。

#### 二、单个家庭口述资料的关键词内容分析

##### （一）A 家庭口述资料关键词分析

A 家庭的大事包括结婚、女儿出生、岳母去世、店铺开业、女主人患胆结石、女儿入学办证难、买车并开始在外跑车、儿子出生、想买社保但苦无门路、S 市异地中考新政策 10 件，表 3-1 结合 A 家庭的口述资料可以得出表 5-1。

表 5-1

	关键词	出现次数
1、社会关系网络	1.1 朋友、同学	5
	1.2 生意伙伴（同事）	3
	1.3 家人（亲戚）	34
	1.4 老乡	13
	1.5 房东	3
	1.6 信仰	0

表 5-1 是根据表 3-1 结合 A 家庭的口述资料分析而成。首先将口述者的口述录音内容整理成 word 文档，在多次分析录音资料的前提下，摘出与关键词相同或相似的词组，在 A 家庭中关于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共出现与关键词相似的词组 30 余个，笔者按照相似或相近词归为一类的原则，做出了归类处理，将所有词

组归入 6 个关键词组,然后将每一类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加起来即可得到表格中出现次数一列的数据,本节的所有表格都是按照此类方法分析得出,在下面表格处将不再详述。

从表 5-1 不难看出 A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以传统的强关系为主,家人(亲戚)、老乡两种关键词一共出现了 47 次,占 A 家庭社会关系的 81%,朋友、同学,生意伙伴(同事),这两种关键词一共仅出现 8 次,关键词房东出现了 3 次。农民工目前虽然暂居城市,但是其主要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朋友、同学,生意伙伴(同事),虽然在表 5-1 中也出现了 8 次,但是实质上这种社会关系只有回到老家或者是彼此同时又是老乡的时候才能凸显,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地缘关系。

表 5-2

	关键词	出现次数
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2.1 教育、培训	31
	2.2 知识、技术	5
	2.3 资历、工龄	2
	2.4 经验	0
	2.5 能力	0
	2.6 健康	3

用与表 5-1 同样的方法得出 A 家庭口述资料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关键词及各小类关键词出现次数如表 5-2 所示,人力资源相关因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与教育、培训有关的因素,出现次数高达 31 次,仅此类关键词就占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 75% 以上,且口述者口述内容反映出的是因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受到限制以及自己对子辈教育的重视。知识、技术类关键词出现 5 次,这类关键词在家庭 A 中既包括没有接受专业培训的知识技术即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练习而成的知识技术,不颁发证书类的知识、技术,如跟师傅学习裁缝;也包括在专业机构学习并颁发证书的专业知识、技术,如机动车驾驶证。知识、技术类事件或多或少会受教育、培训类事件的影响。健康类关键词在 A 家庭中出现了 3 次,主要是指老公因为眼睛血管瘤等健康因素的影响,导致现在老公只能够从事收入较低且很不稳定的工作。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低是其向上流动最大的限制因素,但是因培训而获得的技术是其向上流动的主要推力因素。

表 5-3

	关键词	出现次数
3、社会融入与排斥	3.1 经济	28
	3.2 政治	2
	3.3 社会关系	7
	3.4 文化	3
	3.5 福利制度	2
	3.6 社区活动	0

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关键词相关数据如表 5-3 所示，经济类关键词出现了 28 次，社会关系类关键词出现了 7 次，文化类关键词出现了 3 次，社区活动口述者一次也未提及。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口述者对社会融入与排斥了解很少，其多次讲到自己经济收入低、且开支大。A 家庭的防御心理十分的严重，笔者最开始的几次访谈几乎都被其拒绝，其担心自己的隐私被偷窥，尤其是与其收入、购买住房有关的信息更是保守严密。A 家庭口述资料显示 A 家庭城市融入还比较差，受到比较严重的城市社会排斥；A 家庭成员在心理上比较信任自己因为培训接触的朋友（口述者称师兄、师姐）或者是有一定亲戚关系的老乡，不信任城市社会中接触的人群，因而 A 家庭成员不愿意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甚至比较排斥城市社会。

表 5 - 4

	关键词	出现次数
4、政策二元分割	4.1 户籍（户口）	5
	4.2 社会保险	9
	4.3 商业保险	0
	4.4 租房、廉租房	6
	4.5 购房	16
	4.6 教育	18
	4.7 医疗健康	39
	4.8 政策扶植	16

A 家庭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的关键词和分析数据如表 5 - 4 所示，政策二元分割类关键词是在 A 家庭口述者口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类，各个关键词一共出现 109 次，医疗卫生类关键词出现了 39 次，教育类关键词出现了 18 次，购房和政策扶植类关键词各出现了 16 次，社会保险类关键词出现 9 次，租房、廉租房类关键词出现 6 次，户籍（户口）类关键词出现 5 次。

医疗卫生类关键词所占比例最大，主要是岳母肝癌因无钱医治去世和老婆胆管结石住院一个多月；口述者提及户籍制度总是与子女入学、购房、社会保险相关联，尤其是与子女教育与发展相关，既有对入学办证难的不满又有对 S 市异地中考政策的不满，在提及因为户籍限制子女入学与升学时情绪异常激动，认为是

制度对农村居民的歧视,尤其是其认为 S 市刚出台的中考新政策规定同等条件下农村户籍考生要比本地考生高 30 分才能录取时,十分的愤恨与痛苦;政策扶植主要是指关于农村居民社会保险与小型个体户可以不办营业执照免缴营业税;每次提到购买住房时都是闪烁其词,很怕被人知道自己已经购买住房,但是口述过程却流露出自己十分希望在城市购买住房,在提到租房时,强调租金高的同时害怕别人知道房子的具体租金金额。口述者购买的是农村社会保险,但是接下来因为儿子上小学不得不想办法购买城市社会保险,否者无法办齐儿子上学所需证件,儿子将不能顺利入学。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A 家庭明显感受到了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不便,尤其是医疗、教育类事件对其影响最大,这种二元分割的政策对 A 家庭夫妇防御心理的形成有一定的促成作用。

## (二) B 家庭口述资料关键词内容分析

B 家庭大事件包括租房条件太差、遭受敲诈、在老家遂宁市买房、老公眼睛患血管瘤、房东涨价快,雪上加霜、儿子辍学、老公脚烂,无法行走 7 件,被访者在口述大事时出现的关键词按照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政策二元分割四个方面分析,如表 5-5、5-6、5-7、5-8 所示:

表 5-5

	关键词	出现次数
1、社会关系网络	1.1 朋友、同学	13
	1.2 生意伙伴(同事)	3
	1.3 家人(亲戚)	73
	1.4 老乡	5
	1.5 房东	13
	1.6 信仰	2

B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关键词数据如表 5-5 所示,家人(亲戚)类关键词出现 73 次,房东,朋友、同学两类关键词各出现 13 次,关键词老乡出现 5 次,生意伙伴(同事)类关键词出现 3 次。家人(亲戚),老乡两类关键词一共出现 78 次,尤其是家人(亲戚)类关键词占社会关系网络因素的 65%,房东也是其老乡,朋友、同学主要是指在老家的朋友、同学,与他们的交往也仅限制在回老家的短暂时间,但是其在口述时心情很是很舒畅。信仰类关键词在 B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了 2 次,主要是指在老家家里供奉了很多菩萨,认为菩萨很灵验,能够保障家人平安。从 B 家庭的口述内容可以看出其社会关系网络仅仅是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维系,B 家庭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是全靠以血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解决的,但也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将其限制在比较狭小的空间内。

表 5-6

	关键词	出现次数
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2.1 教育、培训	43
	2.2 知识、技术	11
	2.3 资历、工龄	0
	2.4 经验	0
	2.5 能力	5
	2.6健康	4

B 家庭人力资源相关因素及分析数据如表 5 - 6 所示，教育、培训类关键词出现 43 次，知识、技术类关键词出现 11 次，关键词能力出现 5 次，关键词健康出现 4 次，资历、工龄和经验类关键词均未出现。与 A 家庭相似的是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与培训类关键词仍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且口述时也是口述自己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限制而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认为读书多不容易吃亏。知识、技术类关键词主要是出现儿子辍学学习修车、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方面，口述者认为虽然儿子也有一技之长但是相比高学历人群，儿子的工作十分辛苦。B 家庭口述者认为受健康（口述者将健康视为能力）限制，自己对家庭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了，认为有多大的能力就赚多大的钱。B 家庭的口述资料分析可以得出，B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最重视的同时也是最缺乏的是教育、培训，知识、技术类在 B 家庭并不缺乏（爸爸以前是砖瓦匠，其老公虽然有技术但是受健康限制无法从事技术工种，儿子为修车工，自己是缝纫工）。

表 5 - 7

	关键词	出现次数
3、社会融入与排斥	3.1 经济	5
	3.2 政治	4
	3.3 社会关系	6
	3.4 文化	8
	3.5 福利制度	13
	3.6 社区活动	2

B 家庭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方面关键词及其数据如表 5 - 7 所示，在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因素方面，关键词社区福利出现 13 次，关键词文化出现 8 次，关键词社会关系出现 6 次，关键词经济出现 5 次，关键词政治出现 4 次。

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社区福利，但是对家庭 B 来说多半是缺乏的，口述者认为这种缺乏是理所当然的，社区活动只应该与当地入有关，社区没有为自己提供社区活动的义务。从口述者的口述中可以发现口述者非常羡慕本市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自己却无法像本市人那样生活，比如本市人每天中午 12 点以前吃午饭，18 点以前吃晚饭，自己每天吃饭的时间要以收荒的爸爸、搭展台的老公回家的时间为准。口述者的收入与支出与本市人有非常大的差别，B 家庭的主要支

出是食品、走情送礼和女儿读书支出，并且尽量在节约除女儿以外的家庭成员的食品支出。B 家庭口述者描述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自己以及家人从事的工作收入低，在城市生活的开支大，自己只能够尽量缩减开支，自己在务工城市除了食品、房租支出外基本上没有太多其它的支出，走情送礼的支出还是以老家的社会关系为主。自己的选举权在老家可以很好的实行，每次村里都会打电话通知相关信息。自己与城市人的文化生活差很大，自己虽然喜欢例如唱歌跳舞这些社区活动，但是认为这些是本地人的活动与自己无关。B 家庭在城市的社会关系是非常缺乏的，比如遭受敲诈、被租东、本地人欺负等，口述者把这些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是租房住的外地人。B 家庭户籍地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基本受到保障，村长会给不在老家的人打电话告知相关信息。由此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受社会关系的质与量的限制，B 家庭的融入程度较低，与城市社会处于相互排斥阶段。

表 5 - 8

	关键词	出现次数
4、政策二元分割	4.1 户籍（户口）	3
	4.2 社会保险	13
	4.3 商业保险	3
	4.4 租房、廉租房	64
	4.5 购房	12
	4.6 教育	13
	4.7 医疗健康	17
	4.8 政策扶植	8

B 家庭政策二元分割关键词与相关数据如表 5-8 所示，租房、廉租房类关键词出现 64 次，关键词医疗卫生出现 17 次，关键词教育和社会保险各出现 13 次，关键词购房出现 12 次，关键词政策扶植出现 8 次，关键词户籍（户口）、商业保险均出现 3 次。

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租房、廉租房类关键词占此类政策二元分割类的 48%，主要是对租房条件差以及房东随意涨价甚至无端赶走租客表达不满；医疗卫生在此类关键词中出现的次数居第二，口述者多表现为对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城乡差距大的不满；在提及关键词教育时，主要是与儿子上高中和女儿上高中以及将来上大学的相关政策有关。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方面，主要是指农村社会保险保障层次低，且医疗保险有些混乱，商业保险则是自己替老公购买的低额度的意外险。在政策扶植因素方面口述者提及的是与惠农政策有关的免征粮食税以及给予农户直补款、灵活的土地政策，口述者在口述这些政策扶持的时候很是高兴。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B 家庭除了对惠农政策满意之外，对其它方面都不满意，认为自己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和限制。

### （三）C 家庭口述资料关键词内容分析

C 家庭的大事包括结婚、女儿出生、开钵钵鸡店，但生意差、买第一套房子、生意有了起色、女儿上小学、老公生病，脑部垂体瘤、买第二套房子 8 件大事，被访者在口述大事时的关键词及基本数据如表 5 - 9、5 - 10、5 - 11、5 - 12 所示：

表 5-9

1、社会关系网络	关键词	出现次数
	1.1 朋友、同学	7
1.2 生意伙伴（同事）	0	
1.3 家人（亲戚）	31	
1.4 老乡	0	
1.5 房东	15	
1.6 信仰	0	

C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9 所示，家人（亲戚）类关键词出现了 31 次，关键词房东出现了 15 次，朋友、同学类关键词出现了 7 次。家人（亲戚）出现的高频率证明 C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血缘关系仍然占社会关系网络的主导地位，主要的血亲关系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虽然工作上可以有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帮助，但是会限制其视野的拓宽以及信息的获取途径；房东出现次数高达 15 次，主要原因与 C 家庭从事小餐饮有关，为了离店铺近方便营业，C 家庭在租房居住的同时还要租店铺做生意，提到次数较多的是租店铺过程中，由于行业的不规范，有些房东在收取租金的同时还得收取提成，甚至是高额的转让费。朋友、同学类关键词出现频率较低主要有这些原因，受教育程度低，同学较少，做小餐饮比较比较忙，结交朋友时间少，并且家人（亲戚）的交际占了其交际的多数时间。由此可以做个小总结，血缘关系仍然是家庭 C 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向上流动。

表 5 - 10

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关键词	出现次数
	2.1 教育、培训	53
2.2 知识、技术	4	
2.3 资历、工龄	9	
2.4 经验	3	
2.5 能力	0	
2.6 健康	2	

C 家庭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0 所示，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教育、培训类关键词，高达 53 次，资历、工龄类关键词出现 9 次，知识、技术类关键词出现 4 次，经验类关键词出现 3 次，出现次数最低的是健康类关键词出现 2 次。

教育类关键词出现次数占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 75%，夫妻两个均是小学文化，独女的教育现在是整个家庭最重要的事，购买住房、户口迁移、努力赚钱等

这一切都是希望独女在认真读书提高学历的过程中不受其它事件的限制。C 家庭是家族最开始做此类小生意的家庭，在家族中比较有威信，现在带着家族中其他的兄弟姐妹甚至后辈均在做此类生意，既有经验又有技术，但是受健康的限制无法扩大经营。夫妻双方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向上流动，但是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比较羡慕高学历者，因而在口述过程中屡次提及对女儿教育的重视，希望女儿能够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做个简单的总结，C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最重视的也是最缺乏的是教育，健康也是 C 家庭的制约因素，C 家庭在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同时期望女儿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表 5-11

	关键词	出现次数
3、社会融入与排斥	3.1 经济	41
	3.2 政治	21
	3.3 社会关系	3
	3.4 文化	5
	3.5 福利制度	15
	3.6 社区活动	0

C 家庭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1 所示，出现次数最高的是经济类关键词，政治类关键词出现 21 次，福利制度出现 15 次，文化类关键词出现 5 次，社会关系类关键词出现 3 次。在提及经济类关键词时，口述者回忆了自己刚做生意时资金主要是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方式解决，现在想扩大投资范围，现在房租是比较大的一笔支出，交警罚款比较多，尤其是新交规出台后，半年罚款 6000 以上；政治类关键词出现时，口述者说自己对老家选举类的事件全然不知，对现在居住的社区比较熟悉。对于城市的福利也比较清楚，自己也享受到一些。在社会关系方面，口述者认为自己的交友圈比较窄，高学历者少。由此可以看出，C 家庭的融入度较高，与农村老家的联系已经不是很紧密，交友圈已经多在务工城市，赞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较少受到排斥。

表 5-12

	关键词	出现次数
4、政策二元分割	4.1 户籍（户口）	16
	4.2 社会保险	14
	4.3 商业保险	9
	4.4 租房、廉租房	31
	4.5 购房	18
	4.6 教育	16
	4.7 医疗健康	89
	4.8 政策扶植	10

C 家庭政策二元分割类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4-12 所示，政策二元分割中 8 类关键词一共出现 203 次，其中医疗出现 89 次，主要包括口述者认为除华西医院以外的医院不可信，以及对农村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报销额度比较满意。由于 C 家庭的店铺与租房均是租房，因为关键词租房出现的次数也较多，主要是对店铺房东的不满，认为店铺房屋出租市场很是混乱，这加大了小型个体户经营的难度。每次提及户籍制度都是与女儿入学、惠农政策有关，既希望把户籍迁到成都比较好的高中附近，又担心因此失去农村户籍而无法享受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但是口述者表示女儿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确认了只要落户到名校附近女儿就可以在名校就读是肯定会办理户籍迁移的。口述者口述的政策扶植是近年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这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让大家感觉到了政策的变化以及农村户口的价值。由此可以得出，D 家庭在政策的二元分割方面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受到的限制比较大，比较明显为教育、购房、社会保险，对租房市场的混乱也较为不满；对商业保险和农村扶植政策比较满意。

#### （四）D 家庭口述资料关键词内容分析

D 家庭的大事记包括温江的第一个工程、老婆孩子到温江、第一套房子、业务（心仪的工程没拿到）、讨薪难、多次打官司讨薪、买第二套房子、老板（老乡、朋友）出事、两个女儿考上大学、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业务少，没事做 11 件大事，被访者在口述大事时的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3、5-14、5-15、5-16 所示。

表 5-13

	关键词	出现次数
1、社会关系网络	1.1 朋友、同学	33
	1.2 生意伙伴（同事）	4
	1.3 家人（亲戚）	11
	1.4 老乡	2
	1.5 房东	0
	1.6 信仰	0

D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3 所示，关键词朋友、同学一类出现的次数最高，高达 33 次，关键词家人（亲戚）出现次数位居第二，出现 11 次，生意伙伴（同事）出现 4 次，老乡出现 2 次，关键词房东及信仰均未出现。D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与 A、B、C 三个家庭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血缘关系出现的次数仅占朋友关系的三分之一，而房东与信仰则一次也未出现，传统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仅占 D 家庭口述者口述社会关系的 26%，D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不是以传统的强关系、次强关系为主而是以次弱关系为主，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会对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

表 5-14

2、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关键词	出现次数
	2.1 教育、培训	
2.2 知识、技术		5
2.3 资历、工龄		2
2.4 经验		2
2.5 能力		1
2.6 健康		0

D 家庭人力资源相关因素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4 所示，教育、培训类关键词出现 17 次，知识、技术类关键词出现 5 次，资历、工龄和经验类关键词均出现 2 次，关键词能力出现 1 次。教育与培训类关键词所占比例最大，口述者认为教育与培训的欠缺更多的是限制了其社交范围，进而限制了其工作与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口述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口述者在大事记中对于两个女儿同年考上大学、同年毕业并找到满意的工作都给予口述者赋值的最高分。其余几类除健康以外的关键词均在其刚到 S 市务工时对其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现在这些关键词都是其拥有的资源。由此可以得出，D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其交友限制较大，其余几类关键词方面的资源都已经拥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构成因素相对来说有利于 D 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表 5-15

3、社会融入与排斥	关键词	出现次数
	3.1 经济	
3.2 政治		0
3.3 社会关系		33
3.4 文化		2
3.5 福利制度		0
3.6 社区活动		0

D 家庭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5 所示，口述者一次也没有提及与政治、社区福利、社区活动有关的关键词，而经济与社会关系两个关键词占社会融入与排斥的比例高达 96%。口述者口述时多次提到自己事业无法上升是因为没有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现在自己认识的朋友大都是与自己处于同样层次的人，交际圈的同质性非常高，与这些人的交际只能够是喝茶等休闲娱乐而无法真正在事业上给予自己帮助。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很少是找亲戚朋友周转而是以贷款为主要解决途径，认为老家人的生活方式是纯粹的节流，口述者的消费方式是开源，希望过花一百块钱出去通过开源赚回两百块钱的生活。文化类关键词出现 2 次，此处的文化实质上是指学历，口述者回忆说自己受学历限制很多事件没有办法参与。D 家庭的社会融入度高，其在经济方面的观点与城市人比

较相似，其交友虽然因学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其融入城市生活。

表 5-16

	关键词	出现次数
4、政策二元分割	4.1 户籍（户口）	0
	4.2 社会保险	0
	4.3 商业保险	0
	4.4 租房、廉租房	3
	4.5 购房	42
	4.6 教育	5
	4.7 医疗健康	0
	4.8 政策扶植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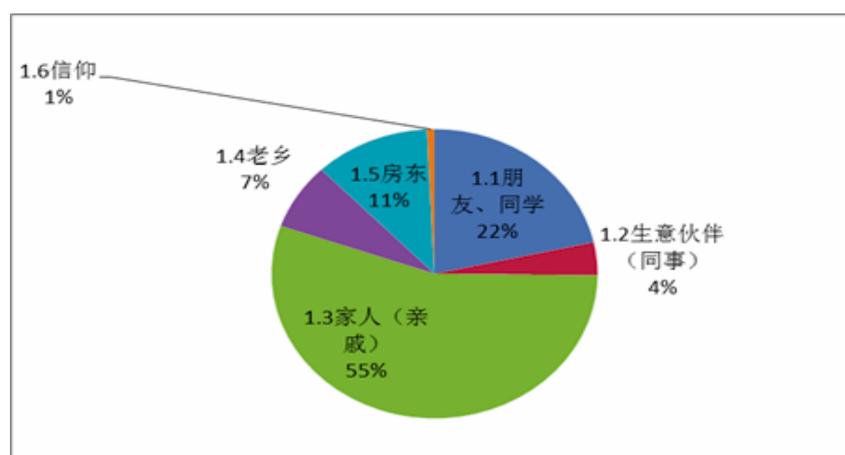
D 家庭政策二元分割类关键词及其基本数据如表 5-16 所示，关键词购房出现次数最多，高达 42 次，关键词政策扶植出现 27 次，关键词教育出现 5 次，租房、廉租房出现 3 次，关键词户籍（户口）、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医疗卫生则一次也未出现。口述者口述了其购房过程中的艰辛，在政策扶植方面主要涉及的是讨薪难问题，口述者来 S 市务工后，已经有 3 次通过打官司的途径来收回项目款。对于口述者来说通过打官司的途径收回项目款虽说过程比较漫长，但是比较轻松，无需自己太费心思就可以收回部分欠款，口述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欠款未收回。政策二元分割现在对 D 家庭来说基本上没有限制，住房早已购买，子女均大学毕业工作，购买了商业保险，讨薪难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 三、关键词综合内容分析

#### （一）四个家庭口述资料共性分析

上面部分笔者对四个家庭的口述史分别进行了内容分析，了解了各个家庭在口述各自家庭大事记的重点，接下来将运用与表 5-1 类似的方法将四个家庭的关键词加总在一起，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因素、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社会融入与排斥因素、政策二元因素分割四个方面分析各类关键词在四个家庭中出现的百分比，如图 5-1、5-2、5-3、5-4 所示：

图 5-1 社会关系网络相关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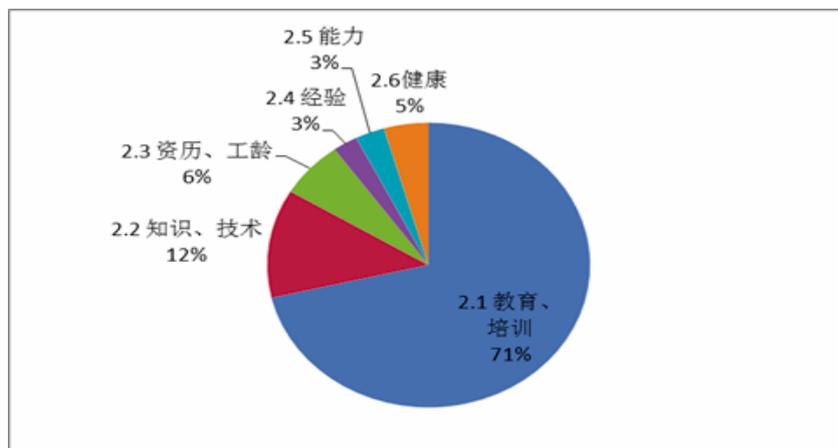


如图 5-1，四个家庭的口述资料在社会关系网络因素的关键词中家人（亲戚）出现次数占此类因素的半数以上，关键词朋友、同学占 22%、关键词房东占 11%。

农民工家庭的主要社会关系靠传统的血缘关系维系，虽然朋友、同学也占社会关系的 22%，但是四个家庭的同学、朋友大部分是指其小学或初中的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朋友也多半是老家在一个地方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朋友、同学是指其关系比较好的老乡，四个家庭的朋友、同学关系可以归结为传统的地缘关系。

关键词房东是外出务工人员所特有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也是大部分农民工所不能缺乏的一种社会关系。与房东关系的好坏以及房东提供住房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一部分人只是租房居住，另一部分人还得租商铺用于经营。在租房居住方面房东不好的态度以及各种苛刻的条件会使农民工觉得自己出钱租房还得被房东看不起，让农民工感受到被排斥；房租的上涨也会让部分农民工感受到生活的压力，省吃俭用来筹集房租也让农民工感受到因与房东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受到排斥。在租用商铺经营方面，农民工主要是感受到房东的剥削，在支付给房东房租之后，部分房东还会收取转让费以及经营利润的抽成，农民工除了不仅觉得自己被剥削而且觉得这是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的一种方式，也极易感受到社会的排斥。

图 5-2 人力资源相关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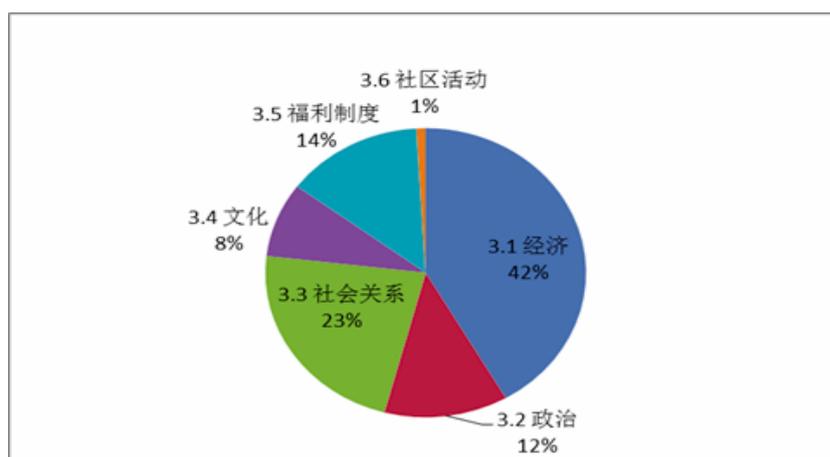
如图 5-2 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关键词教育与培训则占了大部分的比例，加上关键词知识与技术所占的百分比高达 83%。

四个家庭的口述资料显示，农民工很明显感受到自己因为受教育低而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只能从事一些受教育高的人群不愿意做的工作，只能结交一些与自己教育水平差不多的朋友等，多次表达自己因为受教育水平低而吃亏。农民工因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而受到了诸多限制，因而对子女的教育十分的重视，盼望子

女能够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而突破这些限制。农民工家庭口述中很多喜怒哀乐都是因为子女教育产生，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受户籍限制，子女在入学时会有比较麻烦的手续，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花较多时间，甚至还得找关系、花钱才能够办到子女入学所需的证件。每个家庭的大事记都包括子女教育与发展的事件，子女上学、毕业等求学过程比较顺利的都是得分较高的好事，即使入学办证比较麻烦这些事情都很容易被忽略。子女求学过程不顺利，比如成绩不好、中途辍学等则是得分最低的大事件，一旦这些事情发生，农民工就容易想起在子女求学过程中办证等比较麻烦的事情。

健康也是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与体力有关且劳保设施不齐全，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缺失或者保障层次较低，商业保险的保险覆盖率低，农民工一旦发生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不但治病没有保障，无法继续从事现有工作，甚至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都会失去保障。

图 5-3 社会融入与排斥因素



如图 5-3 四个家庭的口述资料显示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出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是经济、社会关系、福利制度。

关键词经济是在此方面出现次数最高的关键词，农民工不仅口述了其收入低、受老板剥削，还口述了在支出方面的节俭。农民工口述资料显示其收入不稳定，自己不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一样工作轻松且工资高，而是靠体力，属于做一天算一天的工作形式，根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在需要资金投入的时候是以向亲戚朋友借钱为首选，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会选择比较麻烦的银行贷款方式解决。在支出方面，农民工的主要支出主要包括房租、子女的教育、老家父母与自己的生活开支，子女教育、食品、房租、走情送礼支出占据了农民工家庭的绝大部分开支，并尽量压缩食品支出的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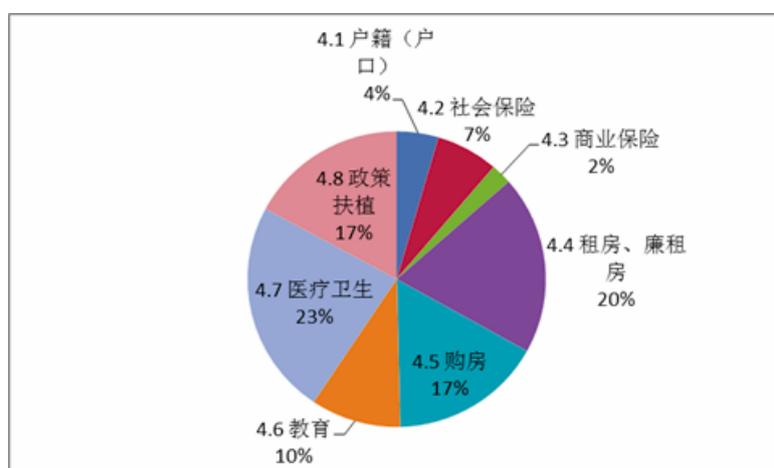
社会关系是四个家庭都会感到受限的一个因素，农民工在务工城市不管是社

会关系的量还是社会关系的质都受到严重的限制,社会关系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主,社会关系的质量不高,存在严重的同质性,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合理,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只能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心理需要,很难帮助农民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在福利制度方面,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该享有的福利制度一般会享有,务工城市的福利制度享受到一些,但是不多。

在政治方面逐渐与老家脱节,老家的选举等事件关心比较少,村上不打电话告知很少主动关心,相对来说对城市自己居住的社区相关事项更为关心。

图 5-4 政策二元分割因素



如图 5-4 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出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有医疗卫生、租房、购房、政策扶植。

口述者口述到医疗卫生时,四个家庭有两个家庭仅购买了农村的社会保险,一个家庭仅购买了商业保险,一个既购买了农村社会保险又购买了商业保险。仅购买了农村社会保险的家庭在口述社会保险好的同时表达了对医疗保险异地治疗报销比例低的不满,而同时购买农村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家庭则对社会保险很是满意,仅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则认为农村社会保险没啥意思。

租房与购房方面,租房主要是对租房市场的混乱管理表示不满,对一些房东乱收转让费以及抽成愤恨的同时又无能为力,购房方面主要是认为按揭必须要提供本地社保不合理,因为很多农民工都没有购买务工城市的社会保险。

口述者在口述政策的变化时,都对农村政策的变化很是满意,口述者口述农村政策从缴纳粮食税到免征粮食税再到现在的直补款以及土地政策灵活的变化,也口述了自己最开始都是想尽办法想将自己以及子女的户籍迁入城市,到现在尝到农村户籍带来的甜头后执意要把户籍留在农村。

## （二）四个家庭口述资料的差异分析

### 1.A 家庭口述资料差异分析

A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的是家人（亲戚），老乡两类关键词，这两类关键词占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 81%，即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 A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A 家庭夫妻防御心理十分严重，尤其是在谈及与购买住房等较大的经济因素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A 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同质性十分强而显得质量不高，较多的限制了 A 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

A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教育、培训，知识、技术两类关键词，这两类关键词占人力资源相关因素的 87% 以上。A 家庭的口述资料显示出 A 家庭夫妻均是小学毕业就到 S 市学习理发，学成后，在路边摆摊理发筹集到一定的资金后开夫妻理发店。夫妻双方多次述说自己文化水平低，很多事情都办不好，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渴望子女能够多读书提高文化水平，但是也说如果女儿成绩不好就不让其读普通高中，去职业高中学习技术，早点工作赚钱。A 家庭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由于教育水平较低受到了限制，但是师徒模式的培训结果让其在务工城市站住脚跟。

A 家庭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经济、社会关系，占社会融入与排斥的 83% 以上。A 家庭的访谈中与“给好处”“拿点儿想头”类似的出现次数较多，与亲戚朋友间较少发生相互借钱的事件，夫妻双方每天都上班很少有休闲娱乐时间。A 家庭夫妻的防御心理十分严重，总是怀疑别人会对自己有坏心思，或是别人总是拿了好处的而自己却没有。社会关系多是以沾亲带故的地缘、血缘关系为主。

A 家庭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出现次数较多的关键词有医疗健康、教育、政策扶植、购房四类，医疗健康占政策二元分割的 36%。A 家庭受医疗健康因素的影响比较大，A 家庭随妻居（上门女婿），岳母患肝癌因无钱医治去世、妻子生长女难产、妻子胆管结石住院一个多月等事件的医疗费用都全是自己家庭独自承担。教育在政策方面的二元分割是 A 家庭最为气愤的，因为是农民工子女，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甚至还需要托关系办理一系列的证件才能摇号入学，今年 S 市出台的中考新政策等事件让 A 家庭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综上所述，A 家庭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传统的强关系占主导地位是其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低是主要的限制因素，但是师徒模式的培训有利于其社会流动；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主要的限制因素是社会关系的同质性；在政策的二元分割方面，主要的限制因素是教育政策与社会保险政策。

## 2.B 家庭口述资料差异分析

B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几类关键词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房东 3 类，房东出现 13 次。B 家庭的社会关系仍然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为主，但是房东占据了 12%。B 家庭来 S 市已经有 16 年，租住房屋变化很大，刚来时租住的房屋没有厕所等条件艰苦严重影响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给整个家庭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A 家庭的社会流动除了受到传统的社会关系的限制还受到了房东的影响。

B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培训与知识、技术两类关键词占了 85% 以上。A 家庭整体上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限制，但 A 家庭除正在念高中的女儿外均有一技之长，但是由于受健康因素的限制现在只有女主人在做摆摊做裁缝、儿子在修车，女主人的父亲（原是砖瓦匠）受年龄限制现在收荒，其老公（原是家电维修）由于眼睛血管瘤导致视力较低的限制在搭展台。教育与健康是 B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的主要限制因素。

B 家庭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出现次数较高的是福利制度和文化的，B 家庭居在现在居住的社区已经有 10 年左右，由于自己摆摊的原因与居住社区的居民较为熟悉，本地人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以及小部分已经定居在 S 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的歧视使 B 家庭感受到严重的社会排斥。

B 家庭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出现次数比较多的是租房、廉租房和医疗健康两类关键词，B 家庭由于租房受到的歧视以及家庭男主人受健康影响收入较低，是 B 家庭社会流动主要的政策限制，即租房政策与社会保险政策是 B 家庭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B 家庭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限制，经过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传统的强关系和房东是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和健康是主要的限制因素；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其感受最深的是生活方式的排斥以及部分定居的外地人的排斥；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租房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 3.C 家庭口述资料差异分析

C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出现次数较多的是家人（亲戚）和房东两类，占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 86% 以上。B 家庭在社会关系方面仍然以传统的强关系为主。房东占社会关系网络的 23%，因为 C 家庭不仅要租房居住而且要租店铺用于经营，租用经营性店铺带给 C 家庭的麻烦较多。传统的强关系与房东是限制 C 家庭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

C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教育、培训与资历、工

龄两类关键词，C 家庭夫妇均是小学文化，因为自己爱好美食，因而喜欢做美食，后来开始靠自己的技术做小餐饮，但是受健康因素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无法扩大经营。因而，在人力资源相关方面，C 家庭的社会流动受健康与教育的限制，但是自己拥有技术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动力。

C 家庭在社会排斥与融入方面，经济和政治因素出现的次数都比较高，C 家庭来 S 市多年，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对老家的关注比较少与现居社区办事人员关系还不错，但是比如直补款、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等有利于其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都还是有享受。C 家庭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限制其社会流动的是与购房、贷款等相关的规定。

C 家庭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对其社会流动影响较大。户籍制度影响其独女的教育以及购房，限制其社会流动。医疗保险与相关惠农政策有利于其向上的社会流动。

综上所述，C 家庭在社会流动过程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过笔者分析大致可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传统的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占优势地位，以及房东的优势地位仍然是其社会流动的限制因素；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健康状况差是其社会流动的主要限制因素，而烹饪技术以及多年经验是其社会流动的有利因素；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贷款规则等资金筹集方式是其社会流动的限制因素，与现居社区办事人员相处融洽是其社会流动的有利因素；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是其社会流动的限制因素，惠农政策以及社会保险是其社会流动的有利因素。

#### 4.D 家庭口述资料差异分析

D 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朋友、同学类关键词，D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男性作为建筑包工头的收入，以朋友、同学为主的次弱关系占优势地位，但是 D 家庭口述者认为自己朋友的质并不高，彼此都处于同一层次，这些朋友不能让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没有结交到社会地位很高的朋友是 D 家庭社会流动的限制因素。

D 家庭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是影响其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D 家庭夫妻均是小学文化，但是两个女儿均已经大学毕业从事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工作。从代内社会流动看教育是其限制因素，但是代际间实现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教育是有力的推动因素。

D 家庭在社会关系融入与排斥方面，社会关系出现的次数最多，D 家庭口述者多次述说社会关系劣势是其事业最主要的限制因素，自己结交的朋友都是自己一个层次的，没有办法结交到社会地位高或者是能够拉自己一把的朋友。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社会关系的排斥是 D 家庭感受到最主要的排斥。

D 家庭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受到的影响比较小，由于较早在成都购买住房，两个女儿读书并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工作的特殊性、购买商业保险等均未受到二元分割的政策的影响。

综上所述，D 家庭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经笔者分析得到大致如下的结果。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D 家庭不再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主，而是以次弱关系为主，但是朋友层次不高仍然是其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限制因素；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对代内流动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对代际流动却是比较有力的推动因素；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无法进入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交圈是其感受到的最主要的排斥；政策的二元分割对 D 家庭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

## 第二节 口述资料情绪字词分析

### 一、单个家庭口述资料中出现的情绪分析

口述史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在对口述资料分析的时候除了对其口述内容进行分析，对其口述的形式进行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即我们不仅要对其“说什么”进行内容分析，还要对其“怎么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进行分析。比如口述者是用普通话口述还是用方言口述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口述者口述事件时的情绪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口述者口述时流露出的情绪不仅仅可以帮助访谈者辨识真伪，还能让访谈者感觉到口述者所口述事件的鲜活性。本文将对口述者口述过程中出现的情绪进行分析，辅助判断口述者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以及不同的事件对口述者情绪激活的强弱程度。

本文的情绪分析是在结合中文情绪字词表记录下的情绪进行内容分析的。在访谈之前结合文献综述设计了表 3-2 中文情绪字词表，访谈时带上中文情绪字词表及时记录受访者在口述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在访谈结束时与受访者确认口述过程中出现的情绪，访谈结束后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反复听访谈录音资料以补充访谈时来不及记下的情绪，此阶段结束后情绪字词表的原始资料收集结束。由于有时候出现的声音和面部表情矛盾等现象导致情绪的捕捉比较困难，笔者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记录出现的情绪。

本部分根据表 3 - 2 中文情绪字词表 (CMACL)以及根据访谈原始资料统计的出现的的情绪以及相应的情绪出现的次数进行分析，得出表 5-17。结合表 5-17 对四个家庭的情绪进行分析，A 家庭的大事件数比较多，口述者在口述的过程中出现的情绪也比较多，整体而言出现的负面情绪比较多。A 家庭口述者对自己打

分比较高的正性事件口述得比较简略,口述者口述的过程中即便是打分比较高的正性事件也多是口述事件比较麻烦的过程。对打分比较低的负性事件口述得比较详细,且出现的情绪比较多且强烈,正面的情绪多出现在自己少年时学开车的愿望实现。

B 家庭出现的情绪类型是四个家庭中最多的,正面的情绪出现的比较多,当口述者口述到其遭受敲诈的时候出现了其在多次访谈中最为极端的负面情绪,而在口述到家人生病时更多出现的是比较低落与担心的情绪,正面的情绪多出现在其谈到父母与子女时,B 家庭口述者出现正面情绪的频率比较高。

C 家庭出现的情绪种类较少,C 家庭已经在 S 市经营钵钵鸡小吃店十多年,且自己是家族最开始从事此行业的家庭并带动家族很多人从事此行业,其正面的情绪多出现在自己受到家族人的尊重以及对自己独女在教育方面的期待的时候,比较低落的情绪出现在其对现在从事本职业厌倦以及对独女现在不爱学习时,极端的情绪则出现在比如城管暴力执法、法定假日调休期间私家车限号容易使口述者搞不清楚而受罚等时候。

D 家庭口述者在口述时出现的情绪是四个家庭中第二多的家庭,相对于其它三个家庭来说 D 家庭是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家庭,D 家庭出现的正面情绪比较多,比较伤心难受的情绪多出现在自己年轻时欠贷款与好朋友出事受到法律的严重制裁时,低落的情绪出现在多次在讨薪过程的繁琐以及一部分欠款无法收回时。

表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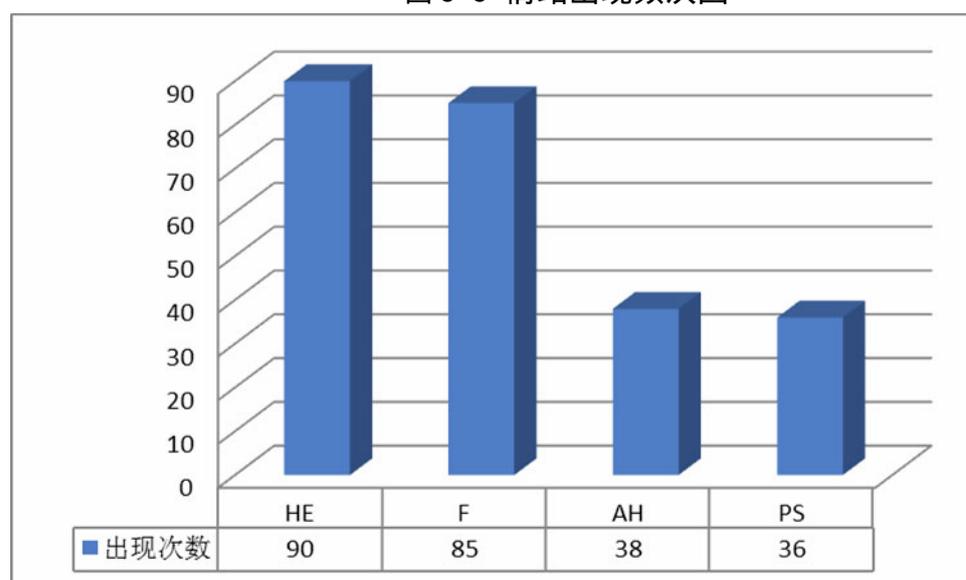
A 家庭情绪统计		B 家庭情绪统计		C 家庭情绪统计		D 家庭情绪统计	
出现情绪	次数	出现情绪	次数	出现情绪	次数	出现情绪	次数
F16 烦恼的	4	F4 厌倦的	2	F4 厌倦的	5	F4 厌倦的	6
F18 难受的	2	F5 消沉的	8	F5 消沉的	5	F5 消沉的	6
F24 别扭的	4	F8 愁闷的	5	F7 焦虑的	9	F18 难受的	3
F26 失望的	1	F16 烦恼的	5	F18 难受的	4	F26 失望的	2
HE1 欢畅的	3	F18 难受的	1 2	F19 不满的	2	HE1 欢畅的	6
HE5 高兴的	1	HE1 欢畅的	6	HE5 高兴的	6	HE4 快活的	6
HE7 开心的	2	HE5 高兴的	1 4	HE9 舒畅的	1 0	HE5 高兴的	3
HE9 舒畅的	5	HE9 舒畅的	1 2	PS12 疑惧的	3	HE8 兴奋的	6
HE16 激动的	5	HE16 激动的	3	PS13 惶恐的	2	HE12 激昂的	2
PS9 恐慌的	3	PS1 伤心的	3	AH6 气愤的	5	PS1 伤心的	3
PS13 惶恐的	2	PS5 痛苦的	4	AH10 生气的	2	PS5 痛苦的	4
AH6 气愤的	2	PS7 哀愁的	1			PS7 哀愁的	1
AH10生气的	6	PS9 恐慌的	3			PS15 遗憾的	6
		PS12 疑惧的	1			AH7 怨恨的	1
		AH3 愤怒的	5			AH10 生气的	2
		AH5 憎恶的	6				

		AH6 气愤的	1			
		AH8 仇恨的	1			
		AH10 生气的	7			

## 二、四个家庭口述资料中出现的情绪综合分析

根据表 3-2 中文情绪字词表 (CMACL) 中的情绪分类以及编码, 将表 5-17 中相同情绪相加后得到 F、HE、PS、AH 四类, 在运用相关作图工具得到出现的情绪频次图, 如图 5-18 所示:

图 5-5 情绪出现频次图



从图 5-5 可以看出正面情绪 HE (Happy and excited) 出现的频率最高, 一共出现了 90 次, 出现频率最低的是伤痛类情绪 PS (Pain and sard)。四个家庭的口述资料显示出四个家庭在回忆自己家庭来 S 市务工后的生活过程中出现正面情绪比较多, 自己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满意。

正面情绪多出现在口述生意、子女教育与发展、住房(购房)、家人朋友(社会)等比较顺利方面。如几个家庭在口述到生意变好时, 几个家庭在口述子女学习时, B、C、D 家庭在口述到购买住房时, 几个家庭在口述到家人团聚时均会出现正面情绪。

烦躁类情绪出现在家人朋友(社会)、子女教育与发展、住房(租房)、讨薪几方面, 主要表现为消沉、烦恼、难受、焦虑等几个主要方面。如口述房租涨价快时, 口述多次讨薪过程的繁琐时出现烦躁类情绪。

气愤类情绪是比较极端的情绪表现形式, 口述者表现为这种情绪的时候口述的事件给口述者的感受如同口述事件正在发生, 此类事件较少。有 A 家庭口述者口述岳父在不告知口述者夫妻的情况下偷偷将癌症晚期的岳母以及不满 3 岁的女儿带回老家时、B 家庭口述者口述在遭受敲诈时、C 家庭口述者在口述城管暴

力执法以及多次因为法定节假日调休期间私家车限号费罚款时较多出现这类比较极端的负面情绪。

伤痛类情绪是四个家庭口述者在口述过程中出现得最少的情绪类型,此类情绪多在口述到家人生病、朋友出事等时候出现,比如 A 家庭在口述到老公患血管瘤初期以为是恶性肿瘤时、B 家庭口述到岳母癌症因无钱医治去世以及老婆因患胆管结石住院时、C 家庭在口述到老公因脑部垂体瘤住院时、D 家庭口述者在口述到既是老乡、好朋友又是自己的老板被枪决时均出现伤心与痛苦的情绪。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在本研究中，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作为被研究对象，是笔者在对农民工有了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设计的本论文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四个家庭的深入访谈以及十多个农民工家庭的初步访谈，在社会流动理论的引导下，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四个农民工家庭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在本文大事记和关键字表以及中文情绪字词表(CMACL)的引导下，得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结论：

(一) 农民工家庭的大事件，主要包括家人朋友(社会)、生意、子女教育与发展、住房、医疗健康、讨薪六方面。特别是家庭团聚以及子女的教育与发展两类大事件是农民工家庭关注的重中之重。

(二)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工社会流动在微观层面上四个影响因素的结论如下：

1、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目前，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以传统的强关系为主，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仍然占农民工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

2、在人力资源相关因素方面，教育是每个家庭都十分关注和重视的事件，受教育程度低是限制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健康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工向上流动。

3、在社会融入与排斥方面，农民工现阶段感受比较深刻的是显性方面的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资金筹集等方面的排斥；农民工自己意识比较少，但是确实影响较大的也容易产生排斥的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的不同。

4、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农民工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感受仍然十分的明显，主要体现在子女教育、购买住房、社会保险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但对于近年出台的惠农政策，农民工十分满意。

(三) 在口述大事件方面，主要分为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和得分较低的负性事件。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农民工在口述时言辞简略；得分较低的负性事件，农民工口述十分详细。由此可见，农民工对外出务工过程中遇到的不好的事件印

象更为深刻。

(四)在出现的情绪方面,负性事件出现的情绪多集中在 F( Fidget )、PS( Pain and sard )、AH( Angry and hate )三类;正性事件出现的情绪多集中在 HE( Happy and eicited )一类。口述负性事件时,情绪出现频次高,且极端的情绪多出现在此时,即负性事件对情绪的激活强烈;口述正性事件时,情绪出现频次低,且以正面情绪为主,即正性事件对情绪的激活较弱。在口述到子女教育与发展、家人团聚、生意顺利等事件的时候出现的情绪变化波动较小以正面情绪为主。

## 二、讨论

在大事件方面,每个家庭的大事都会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与他们共同的身份农民工息息相关。很多农民工在开始时均是一个人到外地务工,然后在务工城市有了一定的资源与资本的积累后再循序渐进地将家人接到务工城市,因而十分重视家人团聚;农民工要想真正在务工城市站稳脚跟,个体户经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经营所得可以说是家庭的全部收入,这直接关系到家人能否在城市生活下去,但是以务工为主的农民工就十分关注作为自己劳动回报的工资能否完全得到,因而生意类与讨薪类事件十分受到重视;子女教育与发展在农民工家庭受到的重视程度会比其他家庭高,农民工自己因为教育程度低受到了很多限制,自身的教训告诉自己必须要多读书才能少吃苦,同时作为农民工比纯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提升,因而农民工对教育投入与回报成正比的高期望与经济收入的提高使得其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发展;农民工一旦发生不健康事件,其对农民工的打击大到很多农民工无法承受的限度,没钱治病、生活困难等接踵而至,只要农民工发生过生病等事件,家庭的整个生活水平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农民工十分需要健康但其自身往往又是各种疾病较多的群体;住房对于农民工来说不仅仅是要提高居住质量,往往还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以及家人的社会保险等方面紧密相联,因而农民工对住房十分关注。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以说是造成农民工现象的根源,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各种资源均是分配不均的,在农民工口述中显示出其对教育的分配不均感受尤其的深刻。每个家庭的口述者口述过程中都会口述自己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吃了很多亏、受到了很多限制,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不仅仅限制了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不愿意从事的脏、苦、累且报酬低并得不到保障的工作。而且限制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质不高,大部分社会关系网络均是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同质性非常高。因而农民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十分的重视,只要子女学习成绩好砸锅卖铁也愿意供子女上学。农民工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与房东的关系,每个家庭

口述资料中都多次出现关键词“房东”，在农民工看来自己在支付了房租给房东让房东有了收益后还得被房东所看不起，遭受房东等当地人的排斥。在社会排斥方面，农民工感受最深的是收入与支出方面，农民工羡慕城市人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而自己却又真正的把自己当成外地人，把社区活动、社区福利等当成是当地人的专利，甚至不需要将这些信息告知自己。在政策二元分割方面，农民工对于近些年出台的惠农政策十分的满意，逐渐看到了农村户籍的价值并不像早些年一味的想拥有城市户籍，虽然不少人已经在城市购买了住房，但是户籍还是留在农村，但是当农村户籍带来的好处遇到子女教育难题的时候都会妥协以方便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在口述大事件方面笔者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即口述者对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描述得比较简略，而对得分较低的负性事件描述的十分的详细。笔者认为可能会有以下原因：首先，公众给“农民工”群体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农民工相对来说确实是弱势群体，但是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后，弱势群体的标签便不断得到加强；其次，农民工自身也认可公众给其贴上的弱势群体的标签，并在内心不断强化自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断的暗示自己生活处境困难，不断强化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可怜之处；然后，经过笔者与农民工家庭的多次接触与深入访谈，农民工对笔者是比较信任的；最后，农民工家庭在不断强化自己是弱势群体之后，他们对笔者的访谈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希望能够通过将些不公平的事件详细的告知笔者，笔者将这些不公平的事件写出来之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更够得到改善，自己的不公平待遇能够有所改观。因而，农民工家庭的口述者往往倾向与将得分较低的负性事件十分详尽的告知笔者，而将发生在其家庭的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则说的比较简略甚至只是提到有这么一事件而不叙述其事件发生的经过与细节。

得分较低的负性事件对情绪的激活强烈，而在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对情绪的激活轻微。家人生病、子女教育不顺利、家人朋友发生不好的事件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等事件时，对农民工家庭成员留下的记忆是十分深刻且痛苦的，加之其期望通过笔者的文章能够对类似的事件有所改观，其愿意详述负性事件也愿意不设防的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而在口述其得分较高的正性事件时，口述者会先在内心做一个评价，当口述者将发生在自己家庭的正性事件与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正性事件相比后，他们会认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好事算不上什么好事，会因为羞于描述而口述得比较简略，出现的情绪也是比较少且比较平和。

农民工社会流动过程中，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不仅要包括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而且要包括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相对于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而言，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较为容易，社会地位的实现多要借助子辈的努力才能完成。

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度的二元分割是很多限制的根源；其次，受教育程度低是访谈中每个农民工家庭都感受十分深刻的限制，这种限制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不遗余力的付出；然后，社会关系也是限制农民工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限制因素，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为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存在社会关系同质性高而且大多数与自己从事的工作相同或相似且是处于相近的高度，即业缘，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相互之间给予不了比较大的支持，还会因限制了交友范围、资源获取等而阻止向上的社会流动；再然后，租房与购房也是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租房加大了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生活成本，奇高的房价让很多想留在 S 市的农民工望而止步；最后，社会保险城乡统筹层次低，城乡社会保险差距大是限制农民工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务工城市购买社会保险，只能参与购买农村社会保险，但是由于城乡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农村医疗保险的异地治疗的保险额度很是有限，农民工生病大多数是在务工城市治疗，治病所耗资金报销很少，不少农民工生病因为无钱而放弃治疗，导致的健康问题也会阻止其向上流动。

## 第二节 本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一、本研究的不足

“农民工”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内外专家学者都被这个群体有了较多的研究，本文是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的质性研究，大量的访谈花费了笔者大量的时间，初次访谈从 2012 年 5 月开始。受笔者本人的限制本论文的研究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本论文由于笔者个人时间、精力与能力的限制，样本选择的地域和数量比较受限制，仅在选择 S 市的几个农民工家庭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

其次，本论文是笔者第一次尝试用口述史方法做研究，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口述史，但对口述史研究相关方法的运用上不是很熟练，做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定量的数据较少；

最后，笔者本次研究是在大事记的引导下进行的访谈，农民工家庭外出务工过程中很多细节会被遗漏，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 二、进一步研究展望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大陆一定时间内还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虽然近些年出台的相关文件已经使农民工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要真正实现城乡统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结合稳妥的方法才能实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独有优势可以为保存很多关于农民工的鲜活资料,为后代了解历史做出贡献,学者们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农民工视角做口述史研究;与农民工有关的制度,比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差距较大的社会保险制度、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制度等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所必须要改革的,这是值得广大学者研究的课题。

## 参考文献

- [1]陆学艺.《“三农”绪论 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
-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3]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4]保罗·唐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
- [5]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王芝芝,姚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6]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8]李向平,魏杨波.口述史的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9]杨详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0]杨恩洪.藏族妇女口述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11]吕国光.农民工口述史[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12]胡明刚,史壹可.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者口述实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13]艾弗利特,拉伯尔.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14]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5]刘红燕.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A]河北学刊.2012(1).
- [16]李运涛.蚁族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 [17]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8]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4).
- [19]彭拥军.教育对农村人口社会流动能力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8,(7).
- [20]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4).
- [21]刘红燕.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J].河北学刊,2012(1).
- [22]常建阁.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2(11).

- [23]章玉钧.从中国大陆口述史发展态势、动因展望未来之路[J].中国文化论坛, 2011(1).
- [24]刘平平.现代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综述[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11(4).
- [25]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2007(1).
- [26]戴烽,姜磊.农民工人力资本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 2009, (4).
- [27]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 2002(4).
- [28]张仁信.农民社会流动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的探讨[J].辽宁经济,1997(12).
- [29]王永进.试析当前转型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6(1).
- [30]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5).
- [31]程丽香.沿海农村的社会流动—来自福建省福清市18个村庄的调查[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3).
- [32]严善平.大城市社会流动的实态与机制—来自天津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0(3).
- [33]郭凡.当前广州社会的代际流动[J].社会学研究, 1995(6).
- [34]刘恩民,彭泽平.教育、阶层背景与社会流动[J].沈阳大学学报, 2008(4).
- [3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36]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7]边燕杰,张宏文.找回强关系[J].国外社会学.1998(2).
- [38]周丹丹.“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读《过去的声音:口述史》[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 [3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研实出版社, 2006.
- [40]高群.《中国农民工》节目新播出季暨《中国农民工口述实录》首发式在京举行[J].今日中国论坛, 2009.
- [41]YanJie,Bian.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28).
- [42]YaoHui,Zhao.The Role of Migrant of Networks in Labor Imigrant :The Case of China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3,(4).

[43]Green,Andy and Germen Janmat.2011.Regimes of Social Cohesion :societies and the Crisis of Glob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44]Henderson P. Including the Excluded: From Practice to Policy in Europe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5.

[45]Taylor M. Communities in partnership: Developing a Strategic Voice [J].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2006.

## 致 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张雪梅老师对本论文写作不遗余力的支持,并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生活。在3年研究生生涯中,恩师不仅向我传递了许多的社会学理论知识,给我提供宝贵的实践机会并指导我将所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我的专业素养;并对我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规划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提高了我对未来的规划能力;最后,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恩师的这些教诲会使我受益终身,能够成为恩师的学生是我毕生的荣幸。同时,对我论文写作提供帮助与指导的文献良老师、黄进老师、刘伟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其次,感谢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学姐李明丽对本论文写作的支持,学姐在此篇论文选题、构思、原始资料收集等方面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同时非常感谢“我看·成都生活”影像志活动和“我看·锦江生活”影像志活动的志愿者对我毕业论文原始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大力帮助与支持。

然后,感谢我研究生期间的所有领导和老师在我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予的帮助与支持,使我明白了长辈关怀可贵。感谢陈序、何佳玲、李奇蔚三年的陪伴以及对我的包容、理解与帮助,同时也感谢研究生期间社会学专业所有同学的相伴与鼓励,使我在三年研究生求学期间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友谊的珍贵。

再次,衷心的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学习无私的支持,对我生活无条件的关怀,免去了我在求学过程中的后顾之忧;感谢我的妹妹、弟弟对我的关心,感谢他们给我带来的欢欣;感谢王君师兄对我的理解与包容。

最后,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论文进行匿名评审和答辩的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 个人简历

## 一、个人情况

姓名：汪妍；

籍贯：四川省达州市；

出生年月：1987年09月。

## 二、受教育情况

(一) 2007.9—2011.6，本科，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二) 2011.9—2014.6，硕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业。

## 三、论文发表

(一) 发表文章《暑期新生活—彭州市灾后教育项目》，书籍主编郭虹；

(二) 发表文章《美丽新家园—龙池镇社区共建项目》，书籍主编郭虹；

(三) 发表文章《二胎政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一期

(四) 发表文章《董事会资本对董事会效能的影响理论分析》，金田。



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

本科定稿，硕博定稿，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

立即检测

免费论文查重：<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流动的农民工呼唤“流动的社保”](#)
- [2. 论青年农民工之社会流动与质变学习](#)
- [3. 农民工的称谓、流动及其社会学意义](#)
- [4. 从农民工的流动性看其社会保障问题](#)
- [5. 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以社会流动的视角](#)
- [6. 我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民工培训](#)
- [7. 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
- [8. 中年下岗职工社会适应口述史研究](#)
- [9. 浅析农民工流动与社会保障问题](#)
- [10. 基于社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转换学习](#)
- [11. 社会资本视角下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与转化学习机制研究](#)
- [12. 农民工流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 [13.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 [14.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
- [15.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
- [16. 农民工社会流动对社会整合的挑战](#)
- [17. 互联型社会关系下的农民工流动](#)
- [18. 流动儿童的同辈群体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城市融入思考](#)
- [19. 贵州省外出务工农民工社会流动问题研究——以贵州在温州的农民工为例](#)
- [20. 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中的负面作用探析](#)
- [21. 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和谐](#)
- [22. 论流动社会下的农民工离婚问题](#)
- [23. 基于流动视角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模式探究](#)
- [24. 流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
- [25.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研析](#)

26.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社会流动
27. 农民工市民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28.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口述史研究
29.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问题研究
30. 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
3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距
32. 试论农民工的社会作用与有序流动
33. 社会流动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路径研究
34. 论青年农民工之社会流动与质变学习
35. 试论当代中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原因和特点
36. 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
37. 基于社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转化学习
38. 社会流动视域中的农民工权益保护
39. 社会流动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路径研究
40. 变迁与分化——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差异与社会流动探析——基于H省一个农民工家庭流动的实证调研
41. 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体制问题
4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流动的问题研究
43. 浅析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民工荒”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44.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影响
45. 我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民工培训
46. 中国农民工现阶段的社会流动——一个基于社会流动渠道的理论解释
47.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
48. 农民工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分析
49. 农民工:流动的城乡界线
50. 社会资本视角下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与转化学习机制研究